

全球对话

13.2

GLOBAL DIALOGUE

一年出版3期,以多种语言刊出

与 Sidney Tarrow 谈社会学

Angela Alonso
Breno Bringel

自由主义、他者 与宗教

Cécile Laborde
Azmi Bishara
Frédéric Vandenberghe
Anna Halafoff

振兴社会理论

Mikael Carleheden
Arthur Bueno
Richard Swedberg
Anna Engstam
Nora Hämäläinen
Turo-Kimmo Lehtonen
Sujata Patel

理论观点

Luna Ribeiro Campos
Verônica Toste Daflon

议题开讲

- > 开放取用、掠夺性期刊或订阅制期刊
- > 比哈尔邦的寻求健康行为
- > 西班牙的心理健康:社会学如何重要
- > 识别隐性暴力
- > 由 Khaldun 观点谈俄罗斯侵乌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13卷 / 第2期 / 2023.08
<https://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GD

> 主编的话

这 是我和 Carolina Vestena 及 Vitória Gonzalez 担任主编以来的第二期《全球对话》，希望你们会喜欢。在担任主编的最初几个月里，我们对于未来如何能让这份刊物走得更远、更广，开启了一系列的讨论。我们将在2024年的第一期刊物中分享这些新的决定，也欢迎各位能让我们知道你们的想法和建议。

首先，本期的人物专访，邀请到了名学者 Sidney Tarrow，由 Angela Alonso 和我进行访谈。我们讨论了社会运动与政党之间的关系，以及其面临的挑战。例如：我们应该如何由「关系」作为切入点、社运政党的潜力、近年来的政治事件和新的学术议程之间的关联，以及全球研究议程所面临的挑战。

在第一个专题「自由主义、他者与宗教」中，我们收录了将于墨尔本第二十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其中，Cécile Laborde 从全新的角度分析国家和宗教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了世俗主义和自由主义正当性之间的关系。著名的阿拉伯学者 Azmi Bishara 则分析自由主义在学术辩论中的改变，及其于政治中发挥的作用。Frédéric Vandenberghe 更从社会学内部辩论的视角出发，认为应当将思考社会学如何延续道德哲学的关怀——例如审查学科中的政治和道德预设，以及其中所蕴含的「自由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剧码。Anna Halafoff 从世界主义与反世界主义互相对抗的脉络切入，讨论保守主义风潮和宗教民族主义的趋势。

第二个专题是由 Arthur Bueno 和 Mikael Carleheden 筹办，主题是「复甦社会理论」。除了简要介绍外，本专题也收录了另外六篇文章，讨论我们应该如何复甦将社会现象理论化的学术研究。Richard Swedberg 和 Anna Engstam 认为创新是关键，Mikael Carleheden 则主张理论多元化。Nora Hämäläinen、Turo-Kimmo Lehtonen 以及 Arthur

Bueno 的文章，则以不同的角度讨论理论和经验主义／实践之间的关系。前者讨论那些作为「大理论」的理论遇上了什么危机，并提出将生活实践或哲学中田野工作理论化的建；Turo-Kimmo Lehtonen 讨论当代社会理论中实践概念的矛盾；后者则讨论社会理论中反殖民主义思想的发展，以及其对全球社会学的贡献。

理论观点的专题，以近期备受关注的话题为主要探讨对象——女性对经典社会理论的主要贡献为何？当前的时代如何为超越经典的追求带来挑战？在回答这些问题的同时，Luna Ribeiro Campos 与 Verônica Toste Daflon 不仅使得女性献身于社会理论中，也促使这些关键议题在全球范围受到讨论。

最后，「议题开讲」则收录了五篇文章，他们分别处理了不同面向但互相关联的当代议题，包括：开放取用、掠夺性期刊与订阅性期刊的争议 (Sujata Patel)；脉络化的健康教育对于解决健康危机、疫情趋缓来说，扮演的关键角色 (Aditya Raj 和 Papia Raj)；社会学解决心理健康危机的能力 (Sigita Doblytė)；人权论述没办法处理复杂的性别暴力，以及承认隐微日常暴力的重要性 (Priyadarshini Bhattacharya)；还有针对俄罗斯侵乌事件，超越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批判性分析 (Ahmed M. Abozaid)。■

Breno Bringel,《全球对话》编辑

> 全球對話以多種語言刊出，請至[官網](#)。

> 投稿來信寄至：globaldialogue.isa@gmail.com



> 编辑团队

主编: Breno Bringel.

助理编辑: Vitória Gonzalez, Carolina Vestena.

副主编: Christopher Evans.

执行主编: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顾问: Michael Burawoy, 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媒体顾问: Juan Lejárraga.

顾问编辑: Sari Hanafi, Geoffrey Pleyers, Filomin Gutierrez, Eloísa Martín, Sawako Shirahase, Izabela Barlinska, Tova Benski, Chih-Jou Jay Chen, Jan Fritz, Koichi Hasegawa, Hiroshi Ishida, Grace Khunou, Allison Loconto, Susan McDaniel, Elina Oinas, Laura Oso Casas, Bandana Purkayastha, Rhoda Reddock, Mounir Saidani,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ón, Nazanin Shahrokni.

各国编辑

阿拉伯世界: (突尼西亚) Mounir Saidani, Fatima Radhouani, (黎巴嫩) Sari Hanafi.

阿根廷: Magdalena Lemus, Juan Parcio, Dante Marchisio.

孟加拉: Habibul Khondker, Khairul Chowdhury, Bijoy Krishna Banik, Abdur Rashid, Sarker Sohel Rana, Md. Shahidul Islam, Helal Uddin, Yasmin Sultana, Saleh Al Mamun, Ekramul Kabir Rana, Farheen Akter Bhuiyan, Khadiza Khatun, Aysha Siddique Humaira, Arifur Rahaman, Istiaq Nur Muhit, Md. Shahin Aktar, Suraiya Akhter, Alamgir Kabir, Taslima Nasrin.

巴西: Fabrício Maciel, Andreza Galli, Ricardo Visser, José Guirado Neto, Jéssica Mazzini Mendes.

法国/西班牙: Lola Busuttil.

印度: Rashmi Jain, Rakesh Rana, Manish Yadav.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Sayyed Muhammad Mutallebi, Elham Shushtarizade.

哈萨克: Aigul Zabirow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Almash Tlespayeva, Kuanysh Tel, Almagul Mussina, Aknur Imankul, Madiyar Aldiyarov.

波兰: Aleksandra Biernacka, Anna Turner, Joanna Bednarek, Marta Błaszczczyńska, Urszula Jarecka.

罗马尼亚: Raluca Popescu,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Bianca Mihăilă, Diana Moga, Luiza Nistor, Maria Vlăsceanu.

俄罗斯: Elena Zdravomyslova, Daria Kholodova.

臺灣: 李宛儒, 呂道詠, 洪柏勝, 廖宇雯, 黃翊碩, 簡芊楹, 郭智豪, 賴奕璋, 林韻柔, 周芸瑄.

土耳其: Gül Çorbacıoğlu, Irmak Evren.



知名学者 **Sidney Tarrow** 在接受 Angela Alonso 和 Breno Bringel 采访时,谈到社会运动与政党间的关系,以及如何由此理解两者。



此专题的主题为「自由主义、他者与宗教」,介绍四位参加第二十届ISA世界社会学大会主席会议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



本专题分析 **社会学的制度化和阳刚化**,指出女性对经典社会学的贡献经常系统性地被忽视,以及其重要性与面临的挑战。

封面相片: 巴西联邦参议院的屋顶。来源: Carmen Gonzalez, 2023。



Global Dialogue 由 SAGE 贊助

> 目錄

主編的話 2

> 社会学对话

反思运动与政党之间的关系:专访 Sidney Tarrow
Angela Alonso, 巴西, 及 Breno Bringel, 巴西/西班牙 5

> 自由主义、他者与宗教

最小化世俗主义:一则辩护
Cécile Laborde, 英国 9

论全面性的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和意识形态
Azmi Bishara, 卡达 11

社会学作为道德哲学的延续
Frédéric Vandenberghe, 巴西 14

宗教国族主义与反世界主义恐怖主义
Anna Halafoff, 澳洲 16

> 振兴社会理论

社会理论的现况
Mikael Carleheden, 丹麦, 以及 Arthur Bueno, 德国 18

在理论化时激发创造力
Richard Swedberg, 美国 20

理论化的方法:召唤多元主义
Mikael Carleheden, 丹麦 22

一起从事自由奔放的社会学!
Anna Engstam, 瑞典 24

大理论之后:哲学何以田野?
Nora Hämäläinen 和 Turo-Kimmo Lehtonen, 芬兰 26

理论与实践之终
Arthur Bueno, 德国 28

实践反殖民社会理论
Sujata Patel, 印度 30

> 理论观点

社会理论经典下的女性
Luna Ribeiro Campos 和 Verônica Toste Daflon, 巴西 32

> 议题开讲

开放取用、掠夺性期刊或订阅制期刊
Sujata Patel, 印度 34

为了给印度比哈尔邦更好的寻求健康行为
Aditya Raj 和 Papia Raj, 印度 36

西班牙的心理健康:社会学如何重要
Sigita Doblyte, 西班牙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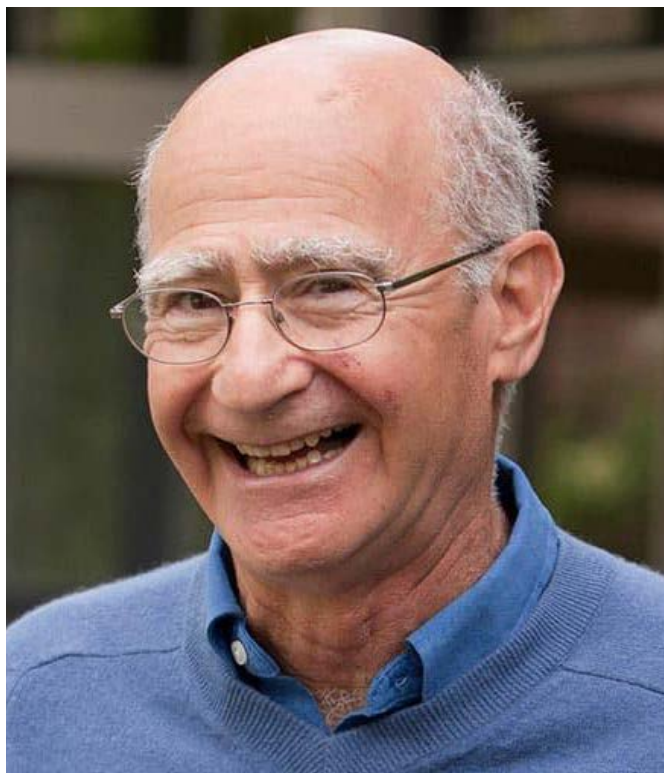
透过识别隐性暴力扩展人权论述
Priyadarshini Bhattacharya, 印度 40

由 Khaldun 观点谈俄罗斯俄乌
Ahmed M. Abozaid, 英国 43

『在高度公众参与的「政治周期」时,很可能同时出现反民主和亲民主的现象。』

Sidney Tarrow

> 反思运动与政党之间的关系： 专访 Sidney Tarrow



Sidney Tarrow 是康乃尔大学政府系 Maxwell M. Upton 名誉教授，专长领域包含社会运动、争议政治与法律动员；并以政治社会学及比较政治研究闻名。他卓越的学术生涯，可以回溯至1960年代。自那时开始，Tarrow 便持续地在社会运动领域中耕耘。去年，他的著名作品《Power in Movement》也重新编辑、出版，其中新增了一些章节，并在新版的结论中谈及了近年来的社会事件，以及最新的学术发展。他最近也发表了《Movements and Parties: Critical Connection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剑桥大学出版社，2021)，并尝试在书中回答以下问题：社会运动如何与政党议程交织？社运与政党结盟时是被收编，还是拥有了更强大的改革力量？虽然这本书以美国政治为主查，不过其中的分析仍为相关领域贡献良多，也是我们会在这次专访中着重讨论的主题。

这次访谈中，由 Angela Alonso 和 Breno Bringel 担任访谈者，两人皆来自巴西，是优秀的社会运动学者，在国际上也颇活跃。其中，Angela Alonso 于圣保罗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其研究与作品多关注文化与政治行动间的关系，以及社会与知识运动；《The Last Abolition: The Brazilian Antislavery Movement, 1868-1888》(剑桥大学出版社，2021)即是她的作品。Breno Bringel 则是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社会与政治研究所的政治社会学教授，同时于西班牙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担任高级研究员，近年来以社会运动、生态社会转型以及拉丁美洲思想为研究焦点。他也正准备与 Miriam Lang、Mary Ann Manahan 两人共同出版《Beyond Green Colonialism: Global Justice and the Geopolitics of Ecosocial Transitions》(冥王星出版社，即将出版)一书。

Angela Alonso 和 Breno Bringel (AA & BB): 您可以为我们简单总结一下，从关系性的视角切入运动与政党的议题，有哪些优势和困境吗？

Sidney Tarrow (ST): 要清楚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回顾我之前那份关于1960年代义大利南部的博士

研究。在像我这样的年轻进步主义者眼中，运动是发生在政体之外，且是好事；而政党则身在政体内部，且是坏的。但是，在了解了农民运动于二战后在当地爆发，并看见共产党与农民运动间的关系时，我才发现这样的理解似乎是错误的——虽然在南方的政党有着运动的性质，这样的现象并没有在北方出

>>

现,反而,其背后有结构完整的工人运动支持。这个政党在南方农村地区遇到的问题,是他们采取了一套为发达工业国家量身定做的策略。我的第一本书《Peasant Communism in Southern Italy》出版于1967年,就是试图讨论这个问题,厘清这个政党在北部和南部为何有如此差距,并解释其在南部地区为何失败。

二十年后,在 Charles Tilly 和 Doug McAdam 等人着作的启发下,我再次将视角转回意大利,希望《Democracy and Disorder》(1989)这本书中,采用当时新兴的抗议事件分析法,以厘清1960、70年代中发生的辩论。Alberoni 等社会学家仍将运动视为政治之外的事件,但我和他们抱持着不同看法。我发现,在街头上发生的事情,和政党系统中的事件有深厚的关系。这两次经验促使我后来参与了「政治过程」这个社会运动研究方法的创立。

最近,另一个二十年又过去了。由于对川普当选总统感到恐惧,我离开欧洲,并与 David S. Meyer 合编了《The Resistance》(2018)一书,并在其中对反川普的抵抗运动进行研究,接着又着手筹备我们在这次采访中讨论的《Movements And Parties》一书。在这本书中,我指出运动和政党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影响美国民主化的关键——有时使得民主化扩大,有时则对其带来威胁,比如现在。

总结这些经验,我发现研究运动和政党之间的关系带给我的优势,是让我得以跳脱政党的制度世界看待问题,这也协助我理解,为何政党的行动方式往往对他们的选举造成不利——这是因为他们试图让自身符合于更多运动的意识形态。这么做的困难之处在于,我试图和两种使用不同方法的研究传统对话,他们分别以各自的方式看待政治制度。比起在拉丁美洲,这在美国似乎更容易被认为引起「麻烦」——这也许也解释了为什么我的着作在你们那边有更正向的回馈。

AA & BB:近年来,有一种理解政党与运动间关系方式,是去讨论运动政党的概念。你对这个概念抱持什么立场?

(ST):在欧洲,Kitschelt 已经在他2006年的文章中对这个概念进行了狭义的定义,主要指的是西欧绿党。2017年,della Porta 则和一些人在他们关于反紧缩运动政党的书中,作出了更广泛的定义。和我的概念最接近的,是 Santiago Anria 最近有关玻利维亚 MAS 的书。

这个概念——简单一点说——在拉丁美洲比在美国更为人所知,但正如我于书中所说,运动政党不断地在

美国历史中出现——从1850年代废奴主义者和共和党之间的关系,就已经可以看见,而 Angela 也在其谈论反奴隶制的著作里指出了这点。

若要分析性地定义这个概念,就必须从许多面向各自谈起。如我在书中所言,政党主要是具有交易性质的,因为它们总是追求权力;运动则更具意识形态的性质。这意味着,一个运动政党同时具有意识形态和交易的特性。为解决这样的矛盾并生存下去,运动政党会转向制度化。若是不这么做,运动政党经常走向分裂——就像1890年代美国民粹党那样,当时一个派系支持民主党候选人 William Jennings Bryan,而另一个派系则坚定主张其农业运动策略。

像玻利维亚人民运动党这样的例外情况很少,而且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组织形式如何能适应其运动与政党特性。在美国,民主党于1930年代持续保有这样的双重性,当时以劳工为基础的派系在北方取得主导,而种族隔离派则在南方握有主导权。但这最终还是导致了分裂,更进步的一派在1960年代加入民权运动,而种族隔离派则加入共和党,一直到今天。

AA & BB:你的书也强调了运动和反运动间动态互动关系的重要性。在谈到川普现象以及支持、反对他的运动时,这种方法在书中流露出某种戏剧化的语调。美国当代的政治冲突如何影响你的研究议程,以致你决定在这本书的关键段落中讨论这个话题?换句话说,您如何看待当前政治事件与学术议程间的关系?

(ST):多数关于反运动的学术研究,都将焦点集中在右派运动上,但我发现这种方式已经逐渐减少。在美国,这种情况在针对茶党和近日「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研究中很常见;这两个运动多被认为是以那些受社会、种族变迁影响的人们为基础。另一个常出现的描述方式,则是介于高度和低程度的政治化之间。义大利人如 Alfio Mastropaolo 便强调许多极右派选民有着反政治的特性,川普支持者就经常声称他们喜欢他的原因,是他「不是一个政治家」。

我在书中使用了「反运动」(countermovement)这个概念,正如 David S. Meyer 和 Suzanne Staggenborg 在他们1996年的重要文章,是为了更好地描述特定运动的兴盛——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如何引发另一个反对运动的兴起。举例来说,在我们共同着作的《The Resistance》中,David Meyer 和我便指出反川普运动的兴起是一场反运动。

不管是对左、右派的反运动而言,特别重要的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总是被他们反对的运动的论述和行动所限制。例如,美国反疫苗运动的反科学言论,影响了

>>

支持疫苗运动，后者利用医生、科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的证词，来对抗反对者的反科学意识形态。

但许多这些运动都是由既存的、更广泛的意识形态运动阴影之下发展出来。例如，当社会科学家追踪疫情的住院率和死亡率时，他们发现这些数字跟选民对川普主义的支持率密切相关。那些川普得票佔多数的州，同时也有着最高的疫情住院率和死亡率。这些政治事件确实影响了学术议程，而我们需要为事件提供答案。

AA & BB: 许多社会科学家认为民主和专制是起因于社会的类型不同。后来，一波研究强调，特定的「政治文化」对于国家走上专制或民主的政治道路，要负更大的责任。你在书中试图寻找一个能解释运动、政党间相互作用的政治机制，且同时以智利、义大利、韩国和美国等文化差异很大的几个国家为对象，而没有提及特定文化中存在的价值观或信仰所可能造成的影响。我可以这样说，你在这本书中，对于政治文化的概念抱持着质疑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到我职业生涯的开端。当时，Gabriel Almond 和他的夥伴一起提出了「政治文化」的概念。他们将美国视为对民主规则共识大于政策分歧的「公民文化」；并将义大利定义为在基本原则缺乏共识的「主体政治文化」。他们的义大利同事 Giovanni Sartori 则更进一步将义大利定义为「离心民主」，对应着英国或美国的「向心」民主。这些人认为，民主的最大威胁是共产党，而如前所述，我曾经在义大利南部深入研究过当地的共产党。在比较所谓的「离心」共产党和中间派基督教民主党选民对民主的态度后，我尝试检验这些观点，发现前者对民主的信心要比后者大得多。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质疑以政治文化为基础的民主定义，并开始研究，到底是什么因素，破坏或维系着民主的运作机制。

在《Movements and Parties》一书中，我简单回顾了后 Pinochet 时代的智利。北美作家认为，智利之所以成为了「强大」的民主国家，是基于强大的政党制度和选民的民主信仰体系。但正如你们所知，智利的政治体系中几乎不存在纵向的问责制。问责制是确保民主的关键，而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个制度实际上的作用，比鼓吹政治文化重要性的人所认为的要弱得多。因此，不管在学术生涯的最初和最后期，我对于政治文化的重要性一直都抱持着怀疑立场。

AA & BB: 正如 Tilly 所言，运动和反运动也跟民主化和去民主化的过程有关。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将这些过程视为不同时期的一波又一波风潮。但是，我

们应该要如何将其至于同个时期中，来处理争议政治的模糊性、复杂性和矛盾因素，又或者说，处理特定面向中的民主化，还有其他面向中的非民主化议题？

(ST): Tilly 是北美民主学者中，少数同时也涉猎社会运动研究的人之一。让人惊讶的是，在针对当前美国民主危机的这波研究风潮中，从未有人提及他的著作《Democracy》(2007)。这本书启发了我，让我回头关注自己过去有关运动与政党的研究，以及民主化、反民主化间动态关系的研究，并在两者之间开启对话。

透过研究历史案例，我发现支持民主和反对民主的运动，经常在同样的关键时刻发生。用 Breno 在其著作中使用的概念来说，我认为在高度公众参与的「政治周期」时，比如美国目前的政治周期，很可能同时出现反民主和亲民主的现象。

在撰写《Movements and Parties》一书时，我就发现美国历史上有几个类似的交织点。首先，随着20世纪早期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发展，一场反对妇女选举权的运动跟着兴起。其次，1930年代的大萧条既引发了民主运动——罗斯福的新政——也出现了一些反民主的运动，比如电台牧师 Coughlin 神父的反犹运动。当然，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也是一个例子，其促成了反黑人权利运动的出现。这些不仅仅是运动／反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事实上，双方的行动，都是以自身认定的民主为名。

让我用于2021年1月6日袭击国会大厦事件中达到高潮的、川普／反川普之间的动态关系，来为这个问题收尾。在那个场合之下，许多像我这样的进步人士，将协助川普发起「autogolpe」(这个词还因此成为英语用词!)的暴徒，视为威权主义的展现。确实，川普及其支持者意图推翻 Joe Biden 正当且全面的胜利。但是，仔细观察袭击国会大厦、支持川普虚假选举主张的这些人，他们许多人的说法，都是以民主和自由的名义，辩护自身的暴力行为。

AA & BB: 谈到当代社会时，您指出了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如何影响了集体行动。但是，你所属的知识传统，似乎已经将社会阶级和政治行动间的关系放在一边，即便这是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您现在如何理解这件事？

(ST): 你说的没有错，政治过程的方法，确实经常低估结构性因素在争议政治中的重要性，像是不平等、阶级，甚至是资本主义。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像我这样的学者反对新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倾向把所有形式

的争论，归结为资本主义引发的连锁反应（注意，这在很大程度上仍适用于 Immanuel Wallerstein 和 Giovanni Arrighi 及其门徒的世界体系方法）。对诸如机会结构等政治和制度因素的关注，导致我们低估阶级和阶级冲突造成的深层影响。

近年来，随着 della Porta 和她的合作者针对大衰退与随后欧洲紧缩政策的研究，人们终于重新重视起将阶级和不平等是为运动动员驱动力的研究。包括美国学者 Jeff Goodwin 和 John Krinsky 等人的曼彻斯特学派，也在其著作中再次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解释运动动员的万能钥匙。在《Power in Movement》的第四版里，我也试图在某种程度上纠正自己的方法可能产生的问题。

AA & BB: 在这场访谈中，我们多次谈到美国、拉丁美洲和欧洲之间的交流管道。幸运的是，如今相关的对话越来越多，而社会运动研究也变得更加全球化。你认为在当代社会运动中，如何能够让全球性的对话更多、更好？

(ST): 在一场短短的访谈里面，我想要提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我认为：除了 Hansperter Kriesi 和 Donatella della Porta 等学者的细心研究外，我们缺少结构化的跨地区比较研究；此外，关于民粹主义运动如何攻击、摧毁民主的跨国比较研究也较缺乏，仅有 Steven Levitsky 和 Daniel Ziblatt 等人试图进行历史的重建；最后，少数年轻学者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具开创性的学术研究，然而关于运动与法律制度间交织的跨地域研究，仍然是较少的。

一定要猜的话，我觉得跨大陆运动比较研究的下一步，是要尝试超越微观和中层分析，并将视角转向争议政治的宏观结构。Donatella della Porta 和她在佛罗伦萨的团队，于经济萧条下欧洲反紧缩运动的背景中，已经开始迈出这一步；但除了他们以外，似乎很少有人试图由宏观结构切入。这样的方法是前几十年社会运动研究的传统，同时也结合了当今政治过程方法的精髓。我很期待下一代学者能朝这个方向努力，并且取得进展。■

來信寄至：

Sidney Tarrow

<sgt2@cornell.edu>

> 最小化世俗主义： 一则辩护

Cécile Laborde · University of Oxford · 英国



| Arbu 绘制 · 2023°

自由主义盛行的国家，应该是世俗的吗？自由主义是否应该严格要求政教分离？事实上，上述的问题不只存在于学理的讨论；虽然在西方世界多数国家皆为世俗的，也允纳各种各样的宗教形式与机构。然而，这件事并不具普遍性。其实绝大多数人们生活的神权政治下（也就是宗教被嵌入国家制度），抑或居住于一个宗教成为人们集体政治认同的国家中。例如，埃及、以色列、土耳其、印度、印尼和波兰等不同的国家，他们政治和宗教紧密联系的方式即让人无法相信任何简化、世俗的政教分离的模式。而这些国家制定法律时，也时常参照当地的宗教传统，并且为宗教的成员提供物质和象征性的好处，且在性以及家庭议题上遵照保守的规范。如此一来，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他们是否不具有成为自由主义国家的正统性呢？遵守政教分离，

以保有国家最低限度的世俗性这项规范，又该不该成为判定一个国家是否为自由主义国家的准则呢？

在我的《Liberalism's Religion》一书中，对于以上论点有深刻的讨论：我认为，世俗主义是一个比人们普遍认识到的更复杂的政治理想。我对世俗主义的不同分支进行梳理与分析，并展示了它与我们（西方）称之为的，在宗教的不同层面之间的关系。我并非提出较为表浅，例如：世俗主义可以旅行吗？的问题——我从自由民主的理想出发，并假设其不以种族为中心；人权、自由、平等和民主，才是众人所渴望达到的目标。接着我提问，国家与宗教需要保持多少距离，以及怎样制度形式上的分离才可能达成上述的理想呢？简而言之，我提取了自由民主制的最低限度世俗标准。

>>

> 四种理想自由民主制度的特征

我认为，以法国、美国这种严格区分国家和宗教的模式为自由民主制的唯一标准，是错误的。世俗主义应该被更广泛且多元的范畴所定义。以最低限度的世俗主义标准来看，具正当性国家、包容性的国家、有限度国家和民主的国家四种国家制度中，皆存在着自由民主的理想。更甚，每种体制都点出了宗教的不同特征，分别为：宗教的不可触及性；宗教的脆弱性；宗教的全面性；宗教的神权性。接下来，我将依序分析上述的论点。

具正当性的国家强调，国家官员只应透过诉诸公共可及性的理由来证明其行动的正当性。在最低限度的世俗主义理论中，只有国家官员才有义务提供公共理由：世俗主义是对国家行动和理由的一种限制，而不是公民的义务。国家官员不具有诉诸神圣教义的权威，或以个人启示来强制要求公民服从法律规范的合理性。可及性的概念，定义了在一定社会中的公民需要分享什么，使得对于解释法律的公共讨论成为可能。重要的是，不会出现「只有」宗教思想被禁止存在，或是禁止「所有」宗教思想存在的情况——强调可及性概念的体制，并不会将否认宗教存在的事实。

包容性国家强调不应该将国家与特定宗教认同联系起来，以免剥夺不同信仰人士的平等公民地位。若政教合一侵害了公民的平等权利，国家象征性地承认特定宗教将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本文将扩展讨论宗教的范畴，超越仅讨论宗教启示和教义对个人的影响，深入探讨宗教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包括文化、民族和种族等议题。作者认为，人们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政治身份上的分裂，以及社会阶层上的处于弱势的情况。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当这些身份成为许多国家难以应对的政治问题，或者导致国家的脆弱和分裂时，一个自由主义国家理所当然地不能成为基督教或印度教国家。相反，当宗教不成为社会分裂的因素时，就不再需要执行政教分离的理由。

有限国家借鉴自由主义国家不应该对公民实施全面的生活伦理的想法。自由主义价值观在宗教层面强调宗教的全面规范，包括教育、性行为、饮食、工作、衣着等方面。然而，许多当代公民拥有的权利，如自由行动、言论自由和生活自由，是在与传统宗教权威的抗争和斗争中赢得。例如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的浪潮推动许多相关法律的制定，如婚姻自由、保障妇女权利和性行为等。此外，在当代非洲和南北美洲，堕胎和同性恋权益引发了激烈法律论战。然而，宗教不仅具有全面规范个人道德的功能。事实上，传统宗教还注重集体规范，如节日，提供人们相互协调和合作指引，这些规范对个人自由的威胁相对较小。

最后，民主国家的存在必要性在于解决公民对个人与集体道德、公共与私人、权利与善的界限分歧。John Locke认为，国家应该处理与「公民」利益有关的事务，而将灵魂拯救这种宗教性问题留给个人的私领域。然而，在与民事和宗教相关的事情上，例如教会自治、反歧视法、人的性质、家庭、婚姻、生物伦理和教育等领域，一般的自由主义原则并没有提供明确且结论性的解决方案。在权力冲突的情况下，民主国家与教会争夺解释权力，结果显而易见的是国家政府获得了最终的主导地位。国家主导了不同领域的划分，并拥有定义宗教和世俗之间界限的权力。我认为，这正是自由主义世俗主义的基本原则：划分和界定成为民主的一部分，成为人民行使公民权利的一种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讨论必然涉及政治，无法将其归结为神授或哲学上的解释。

> 民主主权

因此，自由主义对宗教提出的最基本挑战并非意图在国家和宗教之间划定明确的分界线，而是基于民主主权的概念。根据自由主义和人权的范畴，人们在各种议题上的意见分歧应该透过民主方式来解决。然而，重要的是要明确指出，民主并不等同于多数暴力，它仍然需要充分考虑少数群体的代表性、权力分散和司法审查。如此一来，自由主义合法民主的概念允许国家与宗教之间具有更多的变化和安排，这一点比起世俗自由主义者或持有特定宗教观念的自由主义者更加宽容。

正如大多数世俗主义者坚信自己对国家和宗教之间界限的概念一样，宗教信仰者也是如此。只要信仰者遵循三个自由主义原则：合理性、包容性和个人自由，他们也会尊重他人的信仰。在世俗化的社会中，国家法律自然而然地促进多数人世俗伦理的规范，例如通过政策和法律来消除传统家庭和婚姻结构，扩大有关人权和反歧视的法规。而在最低限度的世俗主义约束下，即使宗教信仰者在一个社会中占多数，他们同样可以在公共领域中塑造他们所想像的社会。除此之外，最低限度的世俗主义并不试图为政治、公共事务、私人领域以及相关道德问题提供标准答案，也不具备这种野心或可能性。■

來信寄至：

Cécile Laborde

<cecile.laborde@nuffield.ox.ac.uk>

> 论全面性的自由主义、 政治自由主义和 意识形态

Azmi Bishara, Arab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Policy Studies, 卡达

布面, 以油彩、丙烯绘制。
来源: Bela Righi ([instagram.com/belafrighi](https://www.instagram.com/belafrighi)), 2020。



在当代社会,关于全面性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之间的区别,引发了激烈的辩论(尤其在学术界)。然而,这两种观点都避免了将自由主义思想实际应用在施政上的必要性。就 Rawls 学派对于自由主义的分类而言,他们认为政治自由主义和全面性自由主义都是多馀的。原因在于 Rawls 将政治自由主义的讨论建立在自由主义原则之上,而这些原则本身已构成全面性自由主义的

大部分价值。然而,这些原则并不是全面性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而是其认识论的先天条件。另一方面,当将全面性自由主义单独提出时,它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政治自由主义。后者在实践中类似于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具有全面性。最后,任何学说的政治版本都必然比非政治版本更全面,因为它需要纳入更多考量。

>>

> 初步发想

人们经常视政治自由主义为管理多元国家体系的一种模式，它既保护公民遵从和超越只强调完美生活的全面性学说的权利，又提供了合理论据来支持和保护这些学说。政治自由主义并不强迫人们接受自由主义教条，因为它假设大多数人同意宪法原则，并以此作为实践的基础。

对于执政的自由主义者来说，他们在政治上遵循自由主义的概念。然而，在执政之外，他们有权实践他们对自由主义信仰的理解。只是，执政者无法完全按照全面性自由主义原则中对于「美好生活」的立场来管理国家，因为无论如何他们仍需要政府机构来实践其政策。

根据 John Rawls 的说法，在理论或实证上皆无法证实：全面性的自由主义更倾向于透过国家强制手段施加于人。全面性自由主义（尽管我对此名称有所保留）建立在对公民自由的承诺和限制国家权力的信念之上，支持此原则的人最有可能反对政府强制灌输特定信念于人民。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自由主义者非常反对政府对社会的干预，同样也强烈反对任何可能侵犯个人自由的国家干预。换句话说，自由主义者渴望政府能赋予人们行使自由权利的意图是明显的。因此，他们不仅会乐见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而且会积极追求这样的政策。

由于政治自由主义关注的是国家的运作，如果这个概念不被积极实践，它的意义就会大幅减弱。此外，它也需要宪法的保障，以避免民主制度中可能出现的多数暴力情况。以近年席卷民主社会的民粹主义浪潮为例，非自由主义的右派利用民主的原则和规范，推动了与政治自由主义原意相悖的理念。更糟糕的是，他们煽动特定情绪在民众中蔓延，使人们情绪化地敌视选举落选者履行其工作的权利，并抵制宪法所提供的保障。自由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这是因为执政者必须在以自由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治理和朝向多数民意的治理之间做出选择。而这种冲突自二十世纪，自由民主制度诞生以来就经常发生。然而，事实上这种危机也可能是良性的，因为它可以促使改革、重新调整现有制度。只是，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国家机构必须具有保护政治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能力。

对于自由民主国家应该具备何种条件，若仅有片面的解读，可能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例如，有一种观点宣称政治自由主义需要透过国家的强制执行（尤其在危机爆发时）；而全面性的自由主义则被视为一种次文化，甚至可能变成中产阶级选择性遵

守、捍卫或以不一致的态度观察的价值观。这种趋势可能导致与社会中更广泛的社会政治进程相互隔离。举例来说，当试图将政治正确观点强加于社会时，所谓的全面性自由主义者则容易受到民粹主义和大众声量的影响，大众甚至可能误解这个概念为一种恩赐。

我认为，在全面性的自由主义中「美好生活」的这个概念，只适用于政府外的自由主义。如果我们试图将意识形态强加给人们，而忽略了保障自由和个人自主权的重要性，那么一切将成为自取灭亡的行为，并有可能陷入非自由主义的困境。

政治自由主义可以被视为一种经过实际执政考验的自由主义，是权力统治下的自由主义形式。对于不同派系的自由主义者而言，在执政时都会遭遇不同的困境。学术界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已经相当广泛（特别是在道德、政治哲学和法学领域），许多讨论都牵涉到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平等的含义，以及集体权利和个人权利的优先性等议题。对于集体权利概念的支持者而言，也存在着分歧。有些人认为这些权利源于个人的自愿结社权，而另一些人则主张群体权利应归属于社区。因此，在群体内如何平衡个人与集体权利、以及群体权利是否应优先于个人权利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

许多研究已经就上述议题展开辩论，这些研究涵盖了数百本书和上千篇文章。在我所了解的范围内，很少有比这更「全面」，并且这也是自由主义所面临的挑战。在研究政治自由主义时，伦理判断的方法可能存在差异，确实有一些不同之处。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自由主义更具全面性，因为它考虑了个别社会和国家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之差异。此外，它必须与全面性自由主义之间的价值观和实践关系抗衡。

> 进一步思考

上述的结论与从威权体制下的生活角度得出的结论一致，在体制外的自由主义仍然可以被归类为政治自由主义。这样的归类是有可能的，因为政权内部可能出现扩大言论自由和公民自由范围的改革方案，或是受到政治反对力量的要求。

在国家社会的层面上，自由主义的思想、原则和生活方式在理论上可能与威权主义的做法产生冲突，实际的例子包括个人道德自主、公民权利和个人自由（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然而，同时它们也可能与其他反对派产生冲突，这些反对派试图改变治理体系，并试图透过国家来强制推行他们的信念。

自从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解体后，世界上大多数的专制政权已不再是极权主义，因为他们不再将一个全面性的意识形态强加于社会和机构。如今，这些政权往往通过主权原则、国家利益、安全和稳定等理由来辩称文化与民主不兼容，并越来越多地引用西方自由主义的失败论述来证明他们存在的意义。所有的专制政权都需要大量施加生理和心理暴力来维持统治的稳定。一般来说，虽然仍有一些反对派群体坚持全面性的非自由主义理论，但他们处于权力场域的边缘。然而，当局仍能利用他们来阻止变革。

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发展。自由主义并非仅以全面性或政治性的形式存在，而是分成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支持政治和公民自由、反对专制主义原则。第二个版本则关注个体，强调个人自由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在这里我不考虑将自由主义讨论局限于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者，因为我认为他们并非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然而，矛盾的是，后者关于个人自由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主义似乎更容易与现有的独裁政权兼容。即使政权压制政治活动和公民自由，对个人自由的关注却相对较小。

当专制国家中自称自由主义支持者们从政治的角度思考时，他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信念：他们应该推缓在政治层面争取个人自由的议题，取而代之提出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治治理政策。这个政策承诺政治的多元化，为不同全面性学说的支持者提供讨论的空间，并保护公民权利和个人道德自主权。然而，这种做法被证明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形式。仅仅关注推翻现有政权，而不努力争取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只会让那些为了选举目的而推崇政治多元化的人受益（至少对于政治精英来说是如此）。最终，我们会发现这种做法并非为了保护自由或个人道德自主而在前进。

重要的是，在专制政权被推翻后，无论这些政治精英在理论上有何分歧，他们仍然展现出政治自由主义原则的存在。然而，由于主导性的大众文化在经历了数十年的专制统治后，不容易支持并宣扬类似于自由主义宪法的政策。因此，公民和政治自由受到限制，无法在公共文化中紮根。

人们常说，自由主义是一种规范性的理论、伦理学的分支。在大学课程和学术会议的层面上，这样的说法也许是合理的。然而，从社会和政治冲突的角度来看，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全面性的观点才变得有意义。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自由主义可能是抽象的、非全面的，尽管其论述相当复杂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相反地，意识形态可以是全面的，尽管在极权主义或包罗万象的教条意义上可能不一定如此。然而，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它的全面性在于它与社会、生活和文化（如语言、宗教、习俗等）以及各个方面的人们的权益紧密相连。因此，自由主义能够通过将自由与人民的文化、权益和爱国主义等意识形态相结合，以解决人民所面临的问题。同时，它也能提出自由主义的政治方案，为个人和社会的解放之路提供支持。当这些讨论超越哲学领域，并融入政治和社会冲突的现实情境时，自由主义就必须具备全面性，因为它与政治密不可分。由此，自由主义者呼吁我们应该将个人和社会从暴政中解放出来，同时不应破坏主流宗教文化而与人民疏远。他们深知必须为经济弱勢的阶层提供解决方案，因为他们绝不会接受一个无法解决经济困境的政治自由概念。同时，那些以改善个人生活方式为核心问题的自由主义者可以与世俗专制政权共存。相比之下，其他仅停留在讨论市场经济概念上的所谓自由主义支持者，他们却忽视了日常生活中被侵犯的人权，或者只为了获得贷款而一味追求金钱，全心全意想要说服执政的专制政府接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

來信寄至：

Azmi Bishara

<azmi.beshara@dohainstitute.org>

> 社会学作为道德哲学的延续

Frédéric Vandenberghe, 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巴西, ISA社会学理论研究委员会 (RC16)

社会学和天文学、生物学、埃及学一样，是一个科学化的学科。学科是用以在科学内部区分出不同领域的重要单位。不过，这种将科学区分为不同学科的做法，是很晚近才出现的。一直到1750年，不管是全职还是业余的科学家，都拥有各领域的知识，就如同百科全书那样。十九世纪时，为了教育目的，人们才开始以学科的形式区分科学知识。

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一直是哲学的一部分。十六世纪，数学形式化与物理实验化等趋势，促使科学革命发生。十八世纪的第二次科学革命时，这些学科才从哲学中分离出来。自然哲学孕育了物理、化学与生物学；而道德哲学则被社会科学（如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取代。至于人文科学，则具有负面的意涵，其中涵盖了一些被排除在自然与社会科学之外的学科。

社会学正是在这种将科学切分开来的时代背景中，随着俾斯麦的德国洪堡大学革命以及拿破崙法国大学校的建立，于十九世纪的欧洲出现。作为历史哲学的实证分支，社会学于德国的 Geisteswissenschaften、英国的道德科学（包括政治经济学）、法国的政治思想的交织中萌芽。虽然社会学被以实证研究的形式制度化，成为了 Wirklichkeitswissenschaften，但其仍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广义道德哲学的传统。

> 社会学与道德哲学

道德哲学不仅涵盖了道德、实践与政治哲学，也涵盖了历史哲学。直到今天，社会学仍然——以 Paul Ricoeur 恰当但违反直觉的话来说——身在「后黑

格尔／新康德主义」的影子中。从社会学参照一系列系统化、互相关联的概念，来定义社会、界定如何研究社会来看，其具有新康德主义的性质。同时，社会学也是后黑格尔主义的，因为其舍弃了绝对辩证，将分析限缩于特定社会机构的历史发展，并崇尚客观。

社会学确实是一门专门研究社会事实的学科。但，社会学其实原先并不只是一门社会科学学科，而是将几个邻近学科结合为涵盖范围较广的社会学，的一门「超级学科」(super-discipline)。用现在的概念来说，就是形成了一种社会理论。在法国和德国，社会学都被认知为一门超级学科，其将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以及社会科学跨其他学科的研究，统整为具有道德正确、政治参与性质，且避免落入目的论与形上学的实证历史哲学。

> 重新建立社会科学

回顾社会学的史前史，是因为我认为我们如今需要将整个社会科学重建。这门学科与外界的互动减少，和哲学、人文学科的距离越来越遥远，在自身方法和资料的限制下，难以解释世界和社会的变迁。社会学不仅没有办法跟上数位化带来的一波又一波社会变迁、难以预料各种危机的出现，更无法于理论层面给予提供社会学许多动能的社会运动任何帮助。面临这些困境的社会学，如今已经失去了对理论野心，甚至切断与自身的命脉——哲学之间的连结。

在美国和法国，出现了一波提倡中层社会学理论的风潮，但我认为这对于社会理论的衰弱，并没有实质的帮助。社会理论如今已由社会学范畴中出走，而归属于普世意义（而非法兰克福学派的市政意义）

>>

「如果社会学中有针对社会学道德与政治前提的研究，其将揭示社会学对于社会不正义与社会病态的批判，仍然不脱离『自由社群主义』的窠臼。」

上的批判理论，以及以后结构主义为关怀、跨学科的「研究」(Studies)。我和 Alain Caillé 共同撰写了《For a New Classical Sociology》，在书中我们提议，要在社会理论、道德和政治哲学，以及「研究」间建立一个新的联盟。我们期望哲学、社会科学和新人文科学能够在社会理论领域中重新被定义，而社会科学也可以符合自身的方式延续道德哲学。

在进化论的社会发展论述中，我们经常能看到欧洲中心主义的踪迹；而历史哲学则预设了历史的存在，认为其将跨越时空的社会和人连结起来。即便人们不再拥护欧洲中心主义，也很难完全避免落入历史哲学预设的窠臼。幸运的是，从后黑格尔历史哲学转向新康德历史哲学，是一条正确的道路。现代性既是一种预设，也是真实存在的；而对社会学这样一门与现代性密切相关的科学来说，历史哲学在其身上留下的印记从未完全消失。

如果说在研究现代社会时很难完全摆脱历史哲学，那么完全拒绝现代性的规范性原则可以说是更加困难。作为现代性的产物，社会学倾向接受现代社会背后隐含的、主体性与自由的规范性原则，这些原则也持续影响着科学体系的形构。社会学研究道德个人主义的社会前提，并不是为了否定规范性原则，而是为了理解其制度化的过程。当这些原则在实践中被否定时，其正当性反而在批判异化与歧视的过程中被强化了。

如果社会学中有针对社会学道德与政治前提的研究，其将揭示社会学对于社会不正义(歧视)与社会病态(异化)的批判，仍然不脱离「自由社群主义」的窠臼。有时这些批判更倾向于认同与真实性的社群主义极端，其他时候则倒向自治与正义的自由主义极端。当社会学面临威权主义或「独裁主义」政权的攻击，重新确认学科的基本原则便是极为关键的——如此才能避免这门学科随着它本该分析、捍卫的世界一同消失。■

來信寄至：

Frédéric Vandenberghe
<fredericvdbrio@gmail.com>

> 宗教国族主义 与反世界主义恐怖主义

Anna Halafoff, Deakin University, 澳洲



16

| Arbu 绘制·2023。

宗教国族主义正于全球范围崛起，其可能会对「他者」施予直接或结构性的暴力。一般来说，这里的「他者」指的是文化、宗教、性别或性取向上的少数群体，以及非人的生命形式。人们经常认为宗教会被加害者滥用，不过一些以「神圣的矛盾性」为主题的学术研究指出，即便宗教可能促使暴力发生，其也有促进和平的潜能。

> 男性支配的严重后果与保守风潮

宗教特殊主义与排他主义，指的是某些人认为他们走在唯一正确的道路上，且拥有接触真理的权力，并因此抱持着优越感；这导致宗教群体与非宗教群体

>>

之间,以及与国家和其他行为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冲突。许多宗教传统中,都存在着「圣战」的概念。因此,当人们感觉自己的宗教受到威胁时,便会认为自己可以合理使用暴力。在许多宗教的教典中,女性和 LGBTI+群体的地位是较低的。除此之外,一些人抱持着宗教高于法律的信念,这对儿童、女性和性少数族群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绝大多数宗教领袖都是男性,而宗教的意识形态,也经常主张人类本就应该支配其他非人的生命形式。

有些人曾预测现代社会将出现世俗化的进程——即宗教的力量和影响力将日益减少,但近几十年来,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我们却看到保守宗教、政治和媒体结盟的趋势逐渐增强,并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

> 世界主义与反世界主义恐怖主义的反弹

借着 Ulrich Beck 的研究,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理解此现象的有效观点,即:这并非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世界主义和反世界主义行动者之间的对立。二十世纪的中后期是非常世界主义的,全世界对于人权、环境权和多元性等议题的重视程度都有所增长。从全球宣言、公约以及地方法律和政策中,这点是很明显可以看到的,其保护少数族群和多个物种,使其免于受到伤害。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样的发展,因为这使得保守派(包括特定宗教团体和机构)的权力和特权遭到削弱。这便引发了反世界主义反弹,以及极端宗教运动和国族主义崛起,他们批评少数族群权益、自由主义和民主等价值,并呼吁回归异性恋框架下的「家庭价值观」。

举例来说,我在2014年首次使用了「反世界主义恐怖」一词,来形容 Anders Breivik 2011年在挪威发动的荒谬举措。当时正值澳洲价值辩论的高潮,而 Breivik 发表的反移民和反女性主义宣言,引用了澳洲保守派政治/宗教领袖贬低穆斯林的言论。Brenton Tarrant 2019年在基督城发起的清真寺枪击事件及宣言,也受到了 Breivik 的启发,其背后带有于欧洲、澳洲发展出来的反移民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

在印度,Narendra Modi 的威权主义印度教民族主义,也导致人们对穆斯林的偏见日益增加,并引发了支持 Hindutva 和其反对者之间的激烈冲突。更可怕的是,普丁以出色的网路宣传,长期将自己定位为保守世界的领袖。普丁政权之所以稳固,是以俄罗斯和俄罗斯正教的特殊主义为基础,而这样的基础当中,则蕴含着恢复俄罗斯昔日辉煌的危险愿景。普丁和 Patriarch Kirill 在侵略乌克兰及对抗西方的过程中,展开了一场残酷的圣战,借着散播仇恨和假消息破坏民主国家,同时还提供其他反世界主义的领袖和极右派运动势力支持。普丁的恐怖行动目前已经受到 Volodymyr Zelenskyy、乌克兰人民及其盟友,以及俄罗斯的反普丁、反战人士如 Alexei Navalny 与其支持者的强烈抵制。

> 我们作为(宗教)社会学家的当前职责

当反世界主义恐怖主义与暴力于全球蔓延,深入了解保守宗教、政治和媒体角色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即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作为社会学家,我们得更进步的宗教/非宗教和平提倡者站在一起,透过有力的谴责和抵抗发挥自身的力量。社会学家从事社会关系和制度的研究,其中包含与社会平等/不平等有关的议题。多年来,国际上众多的社会学研究,已经指出种族主义和歧视少数族群可能带来的危害,也阐明了包容、归属对于个人以及社会的和平与福祉有何其重要。

宗教社会学家过去较关注宗教上的少数族群经历了哪些歧视,以及其有何负面影响,却较少揭发,或是实质上预防宗教与精神迫害。

近年来,人们已经普遍认同「宗教自由」的大旗,逐渐从抵制仇恨转移到了合理化歧视观点的行为手上。有鑑于此,作为社会学家的我们,也有必要准备好探究与宗教相关的一切仇恨和伤害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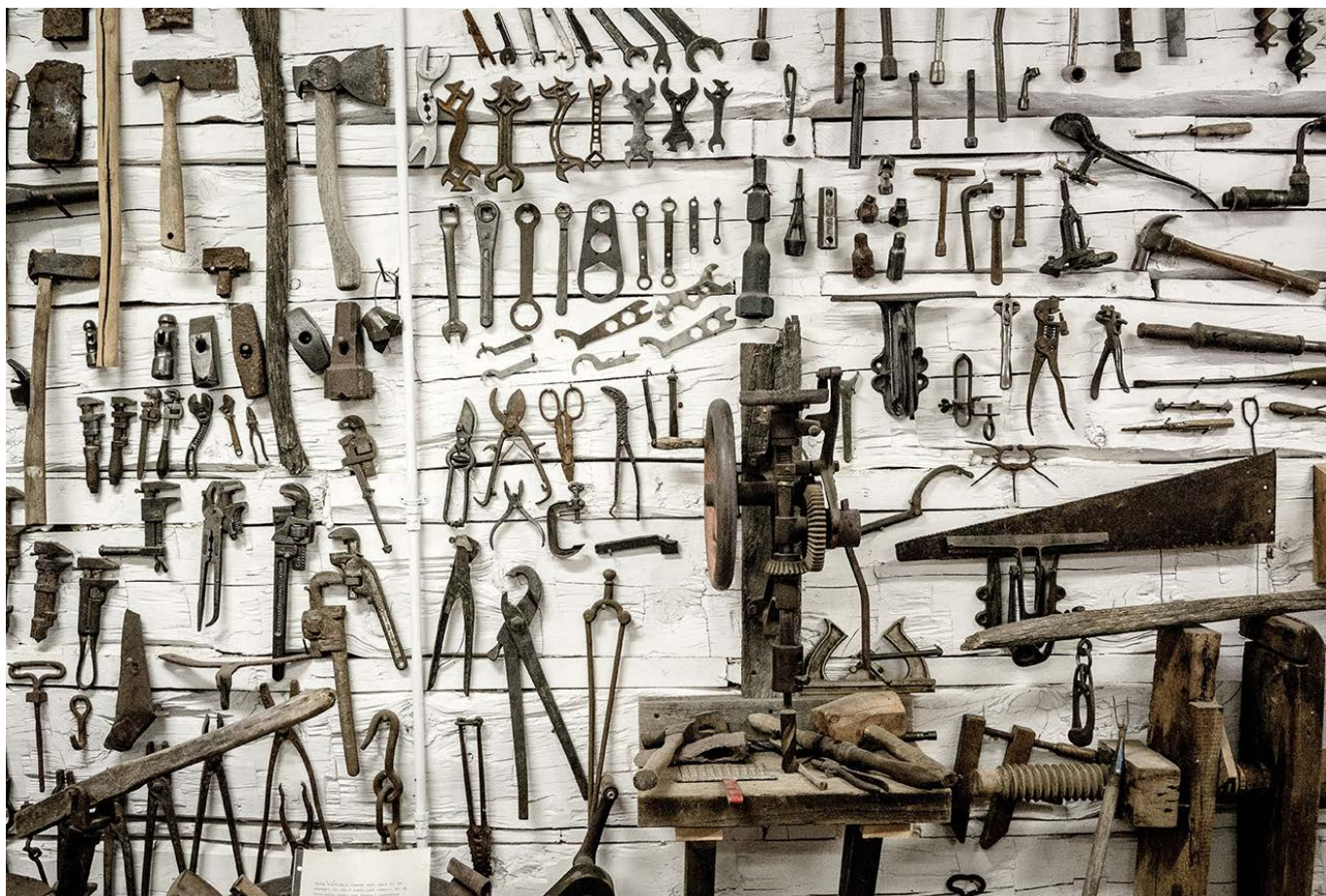
來信寄至:

Anna Halafoff

<anna.halafoff@deakin.edu.au>

> 社会理论的现况

Mikael Carleheden,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丹麦, Arthur Bueno, University of Passau 以及 Goethe University Frankfurt, 德国



来源: Lachlan Donald, Unsplash。

“**在** [理论被理论化之前](#)”。似乎轻易地能区分理论和理论化这两组词,其意思即是理论性产物以及生成理论的过程。然而,事实上这样的区分敞开了一个全新领域的探索。当我们在理论化的时候,我们究竟如何去执行?有任何技巧可以操作吗?它是一种技术、工艺抑或是一种理论化的研究方法?那我们又该如何去构思、发展与教授这项研究方法?最后,当我们提出这些疑问时,我们会感到非常震惊,因为这些问题在社会学的历史中长期不被重视的。

提起这些疑问的动机是源自为了产出[更好和更大胆的理论](#),进而试图将我们关注的焦点从理论

转移到理论化。然而,也有其他不同的原因,即理论在当代社会学地位中的式微。[「社会理论作为志业」](#)仍然可能吗?看起来不只是[「理论的漫漫长夏」](#)早已结束;更甚,在国际社会学领域做研究的学者们发展社会理论的意愿也不断地[「遭到侵蚀」](#)。

只是,与其哀怨着现况,我们更应该去反思这个情况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当我们把视角放到整个二十世纪中主要的社会理论学者在学科建制里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就可以更清楚看见社会理论所遭遇的现况。在上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征兆,而自此之后情况只有日益严重,如社会学相关学科的枝蔓衍派,以及对量化实证研究的重视。可

以肯定的是，这个时期也标志了新世代社会理论学者的湧现，然许多那个世代的学者也对宏大的理论化持保留态度——其中一个例子为 Bruno Latour，一个反对理论的理论学家。

其中，有个很好的理由说明这样的转变。随着理论在学界热络发展的终结伴随着在学科建制内部的净化讨论，包括多关注个别领域的特殊性，及凸显常民行动者在构建社会学知识的贡献。此外，也考虑到了不同语境下的知识生产促使对学科内部规范提出质问，及外部观点的价值重估 (Bueno et al. 2022)。

另外，这样的倾向并不仅仅在知识份子的论辩中成形，同时也带来了机构内部对于学科体制的转变。当宏大理论式微时，给予实践理论问题的空间也在逐渐地消失。以社会理论作为学科专业的条件——换句话说，作为「常态科学」的一部分——已经逐渐被侵蚀。弔诡的是，对于宏大理论的批判强化了那些被注定被视为有问题的倾向。理论可能变成具有得天独厚条件的伟大作者所独佔的工作，此外风险更创造了在经验研究和社会理论间一个比以往来得更巨大的鸿沟。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启一个关于理论化方式的论辩则能被理解为实证主义论争2.0的开始。

基于这些原因，我们认为去讨论社会理论的现状是非常关键的，其中并不是致力于返回过往的光荣（在许多层面上也不见得是光荣的），而是借此去更加厘清不同理论化的方法和方式，和其在社会与政治上的影响。社会理论应该在社会学中扮演何种角色？这些理论化的方式与社会学里不同的传统、社会学知识有多大的连结？这里是否有某些——或多或少指涉——理论化概念正在消亡，又或者有其他概念正死灰复燃呢？

就如同读者所见，在此特辑中的这篇文章并不旨在为这个疑问提供一个标准答案，更不是意图要回到过往的理论化模式或是忽略当前的挑战，而是借着多元精神探索如何振兴当代社会理论的各种可能性。■

來信寄至：

Mikael Carleheden

<mc@soc.ku.d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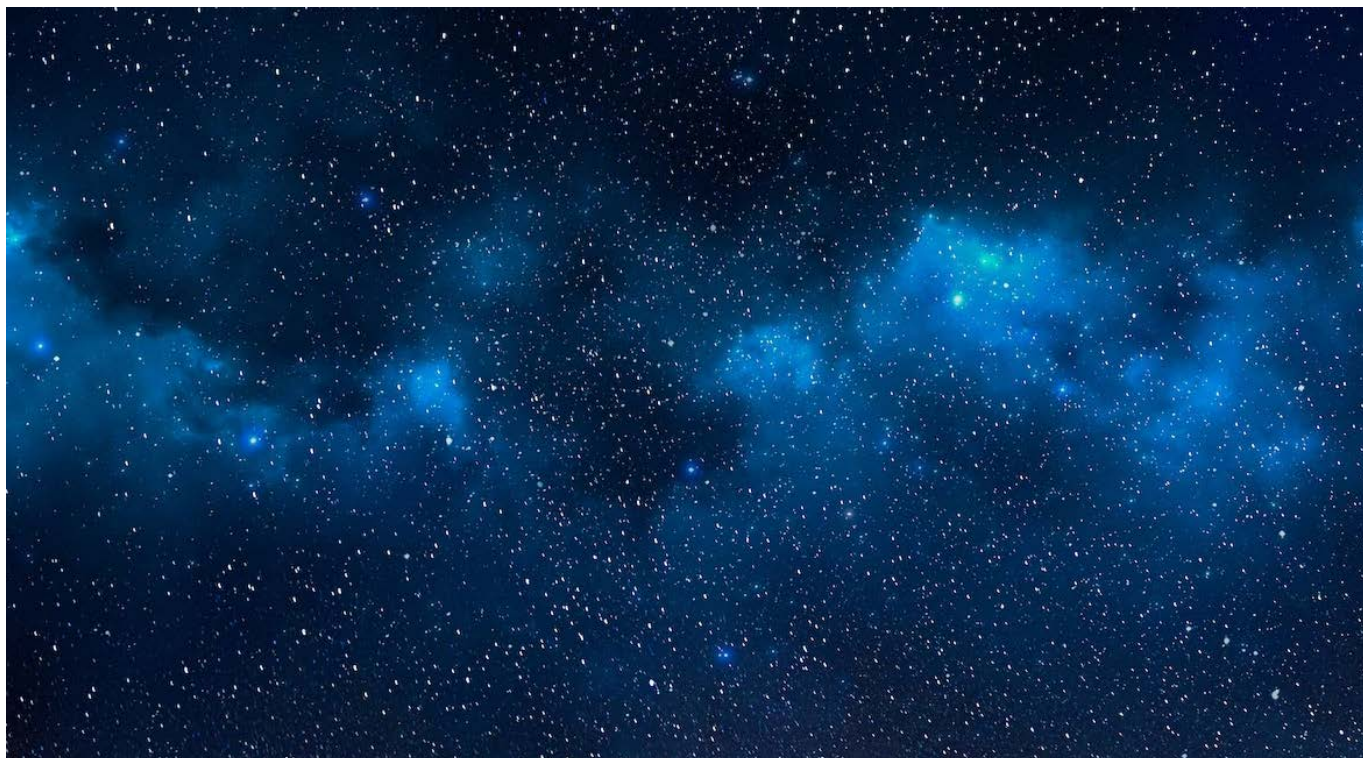
Arthur Bueno

<arthur.bueno@uni-passau.de>

/Twitter: [@art_bueno](https://twitter.com/art_bueno)

> 在理论化时激发创造力

Richard Swedberg, Cornell University, 美国



| 来源: Alex Lanting, Unsplash

要求你的理论化过程增加更多创意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这有可能吗?如果有可能,那又该如何进行?事实上,多数人皆同意不太可能给定如何更有创意的方法。然而本文所想要讨论的,是关于「激发创造力」这件事。也就是,你可以将自己放在一个你「有可能」会创造一些新东西和新价值的位置来进行思考。

对社会学家来说,如果想知道激发创造力的方法,自然而然的是去进行与创造力有关的社会研究换言之,我们可以由观察在涉及知识探索及创造力

的部分所得出的结论中,哪些因素至关重要。但这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因为这些在社会学分析中被视为重要的因素,时常不能为个体所用。就如同 Gilbert Ryle 所阐明的,专业的「知识 (knowing-how)」并不等同于「知晓 (knowing-that)」。

然而,似乎仍存在一种研究创造力的学科,以及将「知晓」转变成「知识」的方式。我称这个过程为「转译」,而本文章将探讨一些为人熟知的关于创造力的社会学研究,并且试着将其中的「知晓」转译为「知识」。

· 研究一: Robert Merton 最知名的论点为: 创造力有时可以借由意外而获得; 或用个他提倡的词: 机运巧合。举例来说, Alexander Fleming 以意外发现盘尼西林为名, 当时在实验中, 他发现有东西掉落在培养皿, 并且到这东西杀死了细菌。《The Travels and Adventures of Serendipity》这本书提到 Elinor Barber 也认为有种环境比其他地方, 使机运巧合更容易发生, 这个地方就是偶然的微观环境。如: 加州 Palo Alto 行为科学高阶研究中心 (Merton 协助设立的地方) 就是一例, 而另一个则是哈佛学会。

· 研究二: 网路是现代社会学中一个非常热门的研究对象。举针对创造力的技术网路分析为例, 其中一个研究为 Ronald Burt 的「结构洞与好点子」。此研究的基本论点是, 一个人如果可以同时利用两个网路, 当个所谓的中间人, 那么位居此位的人比起他人更是身在一个适合创造力诞生之位置。举例来说, 身为一位社会学家, 但同时也与其他不同学科的人合作如: 寻找与认知科学、生物学领域的专家共同合作。

· 研究三: 如何借由网路分析来解开历史上关于创造力的秘密, 可以在 Randall Collins 大部头的哲学史著作《The Sociology of Philosophies》找到答案。这本书提及创造力是由三种层次的力量经由交互作用后碰撞出的反应, 而这个三个力量则为社会、组织与网路。透过德意志启蒙运动的例子, 我们发现: 社会的力量来自于法国大革命, 而组织的关键力量来自于柏林大学, 最后, 其网路则是由康德和其他由学生、同侪组成的特殊结构。由此可见, 创造力网路时常一开始来自于多个开放空间, 但随后就难以寻觅尚未被占领的空间。

· 研究四: 网路有其扩散的边界, 但团队并没有, 其在当代科学的角色中也不尽相同。一个由行为科学家 James A. Evans 和其同事发表重要的关系研究, 刊登在2019年的《自然》期刊中, 研究是关于在团队中的数个科学家与其创造力。他们发现在非常小的团队与独立研究者比起研究团队更容易具有颠覆性的

研究发现, 然而大型团队更擅长于常规科学和次要的发现与追求团队计划的存续有关。

> 如何激发创造力

在本文一开始, 我指出单一个人无法为创造力开立处方籤, 要激发创造力才是可行的。我也宣称多数关于创造力的研究多关注在「知晓」, 而「知识」才是最需要的。其中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认为是透过我称为转译的过程; 而现在就是展现其如何可行的时刻了。

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 找到任何可能激发创造力的事物, 如刚刚上头提及的研究: Merton 提及偶然的微观环境、Burt 和 Collins 的特定类型的网路, 和 Evans 等人的科学研究团队的量体大小。

第二步, 去理解如何有效利用这些因素来达成自身的目的。当你为了上述研究进行操作时, 结果如下。你能够, 例如成为偶然的微观环境其中一份子, 加入新创网路, 或实际参与看起来较为可靠的团队。希望在付诸实行的同时, 你的意识与潜意识将能够创造性地运作起来。

但是, 分别单独施行这些方法也是有可能激发创造力的, 如 Burt 提及跨越两个分立网路的中间人, 其实有非常多方式能够去进行, 如探究在自身以外的团体或学科中人们的想法, 并希冀这些想法与自己的想法时能碰撞出一些火花。

唯一能够肯定的是, 当你试图激发出创造力时, 永远无法保证结果成功与否。不过, 当遇到必须理论化之时, 你必须致力于提供崭新与具创造性的事物。常言之,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來信寄至:
Richard Swedberg
<rs328@cornell.edu>

> 理论化的方法： 召唤多元主义

Mikael Carleheden,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丹麦



社会学家是坐在三脚凳上的科学家。那三支脚分别是质性研究、量化研究和社会理论。如果其中一支脚状况不佳，凳子就可能断裂，社会学家就会摔倒。

来源: Charles Deluvio, Unsplash。

我们该如何理解理论性工作与经验性工作之间的关系？社会学家几乎以高度成问题的方式谈论这个课题。诸如「一个极深的裂缝」(Parsons)、「分离」(Blumer)、「极具破坏性的分裂」(Joas 与 Knöbl)等都是常见的宣称。试图理解这段关系的历史和社会学这一学科本身的历史一样久远。这些提议已随着支配性的方法论信念的改变而改变。从这段历史来看，一种多元主义取径看起来是合理的。因此，一个可能的出发点是：社会学家是一个坐在有三条腿的凳子上的科学家，这三条腿分别是：质化研究、量化研究以及社会理论。但凡其中一条腿走形了，凳子便将破裂，而社会学家也将就此摔倒。

这些「腿」指涉的是社会学从内部所分化出来的三个主要的子领域，而凳子作为整体则意味着上述三个子领域之间的相互依存性。三个子领域所发展出来的不同的技术和知识其实对彼此都有好处。在不失去差异化和专业化所带来的效益的情况下去整合这些技术和知识的需要，正在「混合方法」的名义下被讨论。然而，这些讨论仅仅聚焦在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三条腿呢？我们是否应该把它加入到混合方法的取径上，以便分析三重关系而非仅仅是双重关系？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建议另一条可行的道路。

> 我们都在进行理论化

我的建议奠基于如下观察：今天大多数社会学家都宣称自己在这种或那种意义下进行理论化。理论化看起来直接地包含在前两个子领域当中，而社会理论则只是间接地与实证研究相关。此外，前两个子领域的理论化几乎不是——至少不是主要地——在第

>>

三次领域的意义下应用和测试社会理论。相反，这三个子领域似乎都包含着不同的理论化实践。如果我所言正确，回应我开篇提出的问题的所有尝试必须把理论性工作和经验性工作之间的多重关系纳入考量。并且，理论化应该被理解为差异的、需要被整合的，如果没有整合，差异化带来的效益也将丧失。

> 缺失的理论化方法

这个建议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只是谈论经验方法，也该谈谈理论方法。我们的第一步首先是把量变分析、诠释性分析和社会理论区分开来。无论如何，每当社会学家宣称他们正在进行理论化时，他们所谓之事以及他们的理论化究竟是如何进行却常常是模糊不清的。相对于经验方法，社会学家对理论化工艺和技术的反思出奇地少——甚至在社会理论的子领域中也是如此。我们很少或几乎看不到关于理论性方法的教科书、课程、期刊、方法环节或者研究网路。因此，理论实践关乎的是「知道如何」(knowing how) 而不是「知道那啥」(knowing that) (Ryle)。所以，为了避免方法论和理论上的帝国主义，并发展理论化的多元实践，我们需要对这些实践进行澄清，也就是澄清理论化的方法。

基于对 Gabriel Abend 所区分的理论的七种含义的重建和开展，我在即将出版的一篇文章¹中提出与社会学三个子领域相关的七个理论化方法，陈列如下：

- 量化研究 (量变分析) :
T¹对事实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经验性概括。
T²建构中等水平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假说。
- 质化研究 (诠释性分析) :
T³诠释：依赖于 (严密而厚实) 的脉络来概念化意义的建构。
- 社会理论 :
T⁴社会理论训诂学。
T⁵社会本体论：概念化社会关系的基本特性。
T⁶社会批判：社会规范和实践的建构、重构及解构。
T⁷关于社会的理论：对社会构成原则及其随时间的改变 (宏观层面) 的概念化。

> 观察抑或扶手椅取径

上述理论化方法的区分是基于两个参数：一方面是理论化和观察 (如：问卷调查、访谈、田野研究和实验) 之间的关系种类，另一方面是理论化的主题。在前三种情况下，理论化直接地涉及了经验研究，但这

点并没有以任何直接的方式使它们摆脱将经验工作与理论工作联系起来的问题。所有理论化的方法都必须考虑到理论是「由证据决定的」。把前三种方法和后四种方法区别开的其实是：社会理论化研究所面临的问题无法透过经验研究得到解决。这些问题恰恰需要「扶手椅社会学」。

无论如何，必须强调的是上述所列的方法应该被理解为纯粹类型 (pure types)。理论性工作往往是借着其中几种类型的结合而组成的。比如，假设-演绎性的方法 (hypothetico-deductive method) 就可被理解为T¹和T²的结合。T⁵、T⁶和T⁷意义底下的社会理论化往往以T⁴为出发点。量变分析需要诠释性分析来进行操作，而诠释性分析需要量变分析来评估其结果的一般相关性。此外，这两种分析都需借助T⁷来辨识结构性原则对其研究对象的影响、T⁵来反思其本体论的出发点以及T⁶来考虑事实的价值负重 (value-ladenness of facts)。相反地，社会理论化需要经验研究的结果来避免纯粹社会理论的空泛。无论如何，社会学向子领域的分化意味着在某些特定的研究计划中只能运用某些理论化方法。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一或两个方法被系统性地追求，而其它则仅从属于其中，具有临时性地位 (ad hoc status) 并被常识性理论化默默地取代。专业化对熟练的理论化很重要，同时也显示了子领域之间合作的重要性。

> 召唤理论多元主义

结论，我的提议是：在连接理论性工作与经验性工作时，我们应该以理论化的多元方法之概念为出发点。这意味着社会学的理论化既非仅仅将社会理论应用在经验研究并加以测试，亦非以量变分析或诠释性分析来取代社会理论。在社会学的历史中这些误解是非常常见的。如今，有许多迹象表明以量变分析为主导的社会学之复兴。我们可能将面对1940及1950年代未曾预见过的社会学的「科学化」。正是这一迹象使我发出理论多元主义的呼召。如果我们无法对我们社会学家所坐的凳子的三条腿都照顾得当，我们将就此摔倒。■

来信寄至：

Mikael Carleheden

<mc@soc.ku.dk>

1. Carleheden, M. (forthcoming) "Unchain the beast! Pluralizing the method of theorizing" in Fabian Anicker and André Armbruster (eds.) *Die Praxis soziologischer Theoriebildung*. Springer. —作者原註

> 一起从事自由奔放的社会学!

Anna Engstam, Lund University, 瑞典



節錄自 Katherine Craster (1841-1874) 的作品《The Centipede's Dilemma》: The Centipede was happy quite, / Until a Toad in fun / Said, "Pray, which leg goes after which?" / And worked her mind to such a pitch, / She lay distracted in a ditch / Considering how to run. 來源: Zach Lezniewicz, Unplash。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那就不能称为研究了，不是吗？”这句名言出自爱因斯坦，一个毋庸置疑的天才型人物。这句话指出了直觉的不可或缺性：不必一直质疑自己究竟在做什么地往前迈进；向无纪律的、非正式的思维开放；要相信自己具备无需明证的理性思考以及决策就能获得有意思的东西的能力。仔细想想，其实你不能通过批判性思维来想出一些新颖的东西，不是吗？原创性的洞见与想法需要透过创造性思维来产生，不仅如此：你必须超越正常的创造力！你必须像天才一样地思考！

Robert K. Merton 会是第一个反对上述说法的人吗？Richard Swedberg 曾指出，莫顿可能是「第一位将理论化作为一种知识、学习及教学的特定领域独立出来的社会学家。」「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是

一件好事。」他常常这样告诉自己的学生。透过这样的方式莫顿强调了有意识地决定如何进行理论化的重要性。Swedberg 发现这很有帮助：「它引发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当你理论化时，你需要仔细关注一些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问题。」另一方面「不以线性和逻辑的方式发生的理论化洞察力」很难与 Merton 纪律性研究的观念相符合。

要提出「好的问题，即一些关于社会世界的古怪的、不寻常的、预期之外并且新奇的现象，」以及「一个回应、解释或者解决这些问题的聪明想法」当然是好的社会学理论化的要旨 (Andrew Abbott)。然而到何种程度我们可以说将发明的过程理智化是一件好的事情？我们关于「如何」的知识 (knowledge-how) 是否可以透过关于「存在」的知识 (knowledge-that) 得到促进？无疑地，此一关于理智主义或反理智主义的问题就是我们把理论化进行理论化时将面临的核心问题。至于爱因斯坦，他告诫人们不要过度地分析 (参1929年由 George Sylvester Viereck 进行的访谈)：「也许你能想起蟾蜍与蜈蚣的故事？」(如果不能，那你就该读一读 Katherine Craster 1971年的情诗!)「我们的心理和情感过程很可能以类似的方式被分析所麻痺。」这个教训告诉我们仔细思考自己在干什么有可能带来破坏性的影响，从而导致性能受损。在 Charles Sanders Peirce 1907年的迷人故事中，他透过直觉的猜测追回了被偷窃的物品可以以类似的方式得到理解。很明确：相信自己能够猜中事情的能力！而这也正是爱因斯坦所做的。

被问及「科学领域的突然飞跃之解释」时，爱因斯坦把自己的研究发现归因于直觉和灵感：「我有时觉得自己是对的，并非知道我是对的。」他为艺术和科学间的鸿沟搭起桥梁这事也挺有意思：「我像一个合格的艺术家能把想像的事物自由地划出来。」上面提到的 Peirce 也是如此：科学家必须承认「探究的艺术」，即假设之构想的创造性层面，此一层面反映出所谓溯因推理的下意识 (非-必要) 层面。你不该急于下结论，而该问「如果…会怎样？」!善用直觉!利用想像力!如此我们知道天才和研究间有何关系了。接下来我还会给你一个孔恩式的答案。

>>

孔恩在其晚年以自己的方式反思了物理学的理论性断裂：「我在可移动的范畴上是一个康德主义者，」他说。让我进一步说明：孔恩是一个区别模糊的康德主义者，一个认识到了天赋在美术领域之外的重要性的康德主义者——一个被尼采所触动的康德主义者？无论我是对是错，我把1962年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读作一次开创性的拼凑：为了弄明白科学史上承诺的非凡转变（正如研究活动的历史记录所显示的那样），孔恩借鉴了康德在1790年的《判断力批判》中关于天才和艺术的说法。在这本巨着的第46至50节，康德告诉我们天才是如何造成的；不仅如此，他强调了作为思考和创作风格的独创性。我是如此理解的：透过非纪律的创造力，一个天才产生了纪律性的艺术作品——一个典范（孔恩）；更具体地说，一个天才透过将多样的直觉型塑成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刺激了迄今为止在其他人或「作家」中都无法交流的想法——超越了既有的概念。简言之，一个天才将非形式的思想转化成一种形式，并且作为未来的孩童，透过共鸣影响着其他的人。

从这个视角来看，天才以思想先锋（Vordenker）的形象被召唤，当严重的异常现象让你感到尴尬时，他会为你打破僵局；他的构想将为艺术、科学以及两者之间的一切事物赋予生气。快乐的科学！孔恩没有忽视科学社群，然而（1962：122）：「在旧典范下所累积的经验（无论是不规则的还是一致的）中」，也就是说，在一般科学从事中，透过「直觉的闪现」，一个新的典范诞生了。但如果你过度有纪律从而推迟了诠释或解释，那么「能够『淹没』曾经模糊的谜题的『直觉的闪现』（这使谜题的组成因素可以透过新的方式被看到从而首次得到解决）」可能就会被阻隔或忽视。这就是为何我们这些研究员，不能将传统当作一个纪律性的母体（孔恩）的主要原因。如何不？即承认「社会理论的艺术」（Swedberg）！并且成为一个合格的艺术家！重点是，即使你不是天才，也可以像天才那样地思考！天才关乎的是你想什么，而非你怎么想。且除非你透过直觉创造出什么东西——即将非形式的想法转化为形式——否则很难说你有什么发现。一个马虎的预研究（Swedberg）可能也是个好的开始！不要那么快开始严格的苦思！

孔恩本人例示了快乐的科学（gai saber）。不仅为了好玩，我们可以把《结构》一书想像成一部古希腊剧：hubris（傲慢，对科学哲学的质疑）、peripety（运转，即促使他进行澄清的那些批评）、catharsis（净化，即「对我的批评的反思」以及其它后记）。他做了什么来开始这一切？透过前折（preflected）。

有时候弯折（flex）你的思考方式是一件好事。而那需要的正是前折性（preflexivity）！

艺术

玩耍的态度
独创性
直觉
非正式思考
下意识地
虚伪地
粗心
不适当的
自由奔放
发散
前折性

科学

有条不紊的态度
纪律性
理性
正式思考
有逻辑地
批判地
细心
严谨的
目标导向
收敛
反身性

在这篇文章中，我尝试给予你们前折性这个观念：是我正在型塑的一个概念。所谓前折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并且这个笨拙的新颖概念能有何用？一个连字号可以带来完全不同的效果，笨拙的词汇借此变成了难以辨认的概念：前-折曲性（pre-flexivity）。如果你知道 prefix（字首）是什么，你肯定对 pre- 感到一点不陌生。而其中的 flex（折曲），是个与由拉丁语动词 flectere（使弯曲）构成的词素 flex-（弯曲）。据此，前折性意味着弯曲以前（before flexion），换句话说，在弯曲的行为或弯曲的状态之前。我想提出前折性作为反身性（reflexive）的相对概念，我也据此把前者构想为对一种重新弯曲的动作的描述。因此，前折性（与反身性一起）可以被理解为顺其自然——更具体地说，是沿着指示的路径继续前进的常态——的相反。从一个孔恩式的视野来看，这就等同于以思想先驱（Vordenker）解决类似问题的方式来尝试解决一个已经提出过的问题，也就是说，无需以创造性的方式提出「回应、诠释或解决真正的问题的聪明的想法」。我的观点是，孔恩书写了前折性而没有对这一现象进行命名。前折性与反身性的区别可以在他对直观与诠释所作的区分的亮光下得到澄清：与反思性思维相比，前折性思维依赖直觉到一个地步可能发生突然的、非结构化的格式塔转换之类的事情。据此，前折性是孔恩科学理论和科学突破的中心。■

来信寄至：

Anna Engstam

<anna_helena.engstam@soc.lu.se>

> 大理论之后：哲学何以田野？

Nora Hämäläinen, University of Helsinki, 以及 Turo-Kimmo Lehtonen, Tampere University, 芬兰



来源: Neel, Unsplash

众所皆知的是，近几十年以来，「社会理论」发生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变化。然而，对于到底发生了什么、如何看待这样的情况，人们的见解不尽相同。

> 从世纪中的「大理论」到世纪末的「研究」

崇尚「理论」的人们认为，如今的社会科学充满了无数的经验研究，却不再试图找到关于社会的普遍理论，也不再能为研究提供有效的新方法或观点。这样的情况与二战后的那几十年间，创造力日益卓越的社会理论领域，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学术领域中萦绕着激辩的氛围，不同思想流派一个接一个建立，且经常彼此对立。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对于美国社会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带来了重大挑战；鲁曼和哈伯马斯针对传播／系统理论有来有往地提出了深具影响力的不同论点；诸如纪登斯和布尔迪厄等思想家，则为了跳脱「行动者」与「结构」的极端并强调「实践」的效应，开创了新的研究议程；大量的哲学辩题也在欧洲社会

学中受到关注，例如 Jean-Francois Lyotard 或 Jean Baudrillard 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著作，还有傅柯的研究中谈到的，权力与知识如何参与于西方主体性的历史形塑过程中。

1980年代末至90年代间，一个重大转向出现了——「研究」当中的各个跨领域学科受到了重视，如：文化研究、城市研究、性别研究、后殖民研究、科技研究，以及最近的酷儿研究和弃儿研究等等。这些研究以崭新的方式，大量地使用过去前几十年间出现的理论概念。社会学研究与人类学、哲学、历史和文学交织，而其研究目的不再是找到能广泛解释世界的框架，而是以经验性为主，并且使用了多元的方法及理论。社会学的多元性，对于经验研究发掘新概念来说是很有帮助的。这些经验研究也逐渐将焦点置于空间性、时间性、体现、物质性、照护实践、知识不正义等主题。

然而，上述性质与大社会理论的目标相去甚远。至少在目前，即便新一代社会学雄心勃勃地试图发掘新的概念及理论，其对于当代想像的掌握仍不如预想。在社会学系中，多数研究都离不开孔恩学派所说的那种「正常科学」(normal science) 框架；其方法和主题相对成熟，且有许多据正当性的概念化路径可供选择。社会学的整个学科，似乎对于借着理论研究高调地复甦已经没有期待，而理论研究及其目的，已经成为了某种边缘化的消遣方式了。

> 生活实践的理论效力

那么，社会理论如今已走到终点了吗？我们认为不是的。我们怨声歎气，并非是因为如今的理论研究不再与过去相同，而是希望能提醒各位：在社会学研究与各类领域交织之时，理论思维仍然健在。我们将这种游移于各种知识遗绪之间的学术形式，称为「哲学的田野工作」。

这个词是由哲学家 J. L. Austin 所提出，他强调我们需要借由熟悉普通语言，来克服哲学的泛化问题。后来，布尔迪厄借用了这个概念——他认为，这个概念对于如何将哲学变成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来

>>

说,是很有帮助的。另外,Paul Rabinow 则以更贴近我们的脉络使用这个概念:他发现,若要有效地处理当代现实的复杂性,借鑑于哲学理论方法中的提问方式会是很好的办法。

那些符合「哲学的田野工作」这个标籤的思想家具有一个共同点,即是他们关注生活实践(语言的、制度的等等)的方式,是具有理论效力的。他们并非只是把一个「巨大的」的解释理论,套用于他们所研究的世界,而是倾向从社会现实出发,来找到理解世界的方式。这可以说是一种由下而上的研究形式,且以产生具有理论意义的结果为目标。

> 广泛领域的重要特征

从「哲学的田野工作」这个词汇,可以看出哲学和人类学实践之间的深厚连结。在我们看来,这个概念也很好地捕捉到了当今许多社会学研究的基调。在现在许多出版物的参考文献列表中,我们看不到有关于「巨观」理论的作品,而是会看到那些以经验材料和历史资料为根基的哲学研究。我指的是像 Michel Foucault、Bruno Latour、Ian Hacking、Donna Haraway、Annemarie Mol 这些哲学家,以及一些人类学家如 Anna Tsing、Marilyn Strathern、Eduardo Kohn、Tim Ingold 等等;对于那些游走于各个领域与传统质性研究边界的社会学家来说,他们的著作有着特别大的影响力。我们认为,广义的「哲学的田野工作」有四个重要特征。

1. 注意到特定场合中的人类生活和活动,具有特定的时空限制,而不是将一切情境都预设为具普遍性的。举例而言,就如 Hacking 在《The Taming of Chance》中所述,在一些制度化的环境中,人们可能会重新巩固现代社会对于「机率」的认知。
2. 具有理论敏感度——关注针对特定场景中发生什么的描述,并确信这些描述具有理论和哲学意义;一个例子是 Mol(2003)便宣称自己在荷兰一所大学医院中进行的人类学研究是与「经验哲学」有关的。
3. 与概念化的学术工作有关——包括被研究的场景中,人们所使用的概念,以及为了描述场景中发生的事情而发展出的概念。如傅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不只指出什么样的论述以及其中的「成员分类」

概念,在19世纪法国监狱、医院、学校、军队中出现的新主体形式中如何发挥作用,更开发出新的概念工具以呈现他的分析,例如「权力的微观物理学」。这些概念扎根于特定的、被描述的场景,完全不是为了「大理论」而生,但却在如今被跨学科、领域的学者们应用于各种不同的研究中。

4. 最后,许多(虽然不是所有)与具有此一特性的研究,都涉及了本体论的问题——现实究竟如何构成?拉图的《Aramis》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深入研究特定科技兴衰的过程中,他透过具体的经验描述,成功解决了涉及人类团结和集体本质的本体论问题。

相较于由上而下地将理论「应用」于后续研究并为理论本身留下足迹,具有「哲学的田野工作」特性的研究,则是为特定观察和使用概念工具的方式留下了纪录。若是人们认为这些工具和观点,在实际应用中也是有效的,那么他们就可以在新的研究场域中运用,并根据其需求修改这些方法。像傅柯、拉图和 Mol 这类学者具有理论敏感度的著作,提醒了那些新兴研究者——面对新的研究对象和问题,尽管去开展出合适且创新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吧!总而言之,如今的理论并没有被侷限在「社会理论」的范畴内,而是在实际进行的过程中,迎来了新的发展和转变。■

來信寄至:

Nora Hämäläinen

<nora.hamalainen@helsinki.fi>

Turo-Kimmo Lehtonen

<turo-kimmo.lehtonen@tuni.fi>

> 理论与实践之终

Arthur Bueno, University of Passau 與 Goethe University Frankfurt, 德国

来源: Boys in Bristol
Photography, Pexels



当代社会学中最具影响力的许多思想，都是以实践的概念为核心(Schatzki等人, 2000)。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思想潮流的新颖之处，并不是这个概念本身有多创新，因为早在二十世纪中期，实践的概念于社会学中已经有很重要的地位——其在能动性与其结构的长期论战中极为关键，也促使马克思主义中「praxis」一词的意涵发生了转变。简单来说，布尔迪厄与纪登斯等理论家不再试图深究无产阶级到底应该采取何种革命形式，反而是从一种于政治上更温和，但也更深远的角度来理解「实践」。虽然此一概念仍处于社会再生产与社会转型的交叉路口，但「实践」更关注的，是持续、日常的社会结构如何经历内在与外在化，而不再与推翻资本主义有必然的连接。

然而，新一代社会学家认为这种理解实践的方法过于狭隘。他们认为，将人的行动解释成是无意间使得社会结构被实现，可能会边缘化人的能动性、将个人的视野呈现得「过度整合」(Archer, 1982)、个体于是便成为了「文化的笨蛋」(Boltanski, 2011)。此观点的认识论并不合理，因为社会学家的任务，便是向身处于特定时空中的人，揭示他们无法察觉的结构性因素。像拉图和 Boltanski 等学者与这些观点持相反立场，他们强调非人具有能动性、人类具有反身性，并指出人应该与这些非人之物学习、对话，而不是等待外部环境或占据支配地位的事物来启蒙自己——借此，这些学者便从根本上质疑了结构的观念。人们曾经认为「社会」或「资本主义」这类结构

性的范畴，能够协助我们解释实践背后的逻辑，但是这项愿望并未实现：它们最终只是忽视了行动者们如何在不同情境间，与其他行动者积极地相互作用。

> 实践的悖论

新一波的社会学借由抛弃过去对实践的理解，提出了一种由下而上的、全新的政治概念。这项行动可以说，是为了推动民主化的进程。说真的，谁能批评这些方法没有比过去更重视行动者呢？谁又能反对这样的政治，认为承认行动者的主动性和反身性，或者平衡分析者和被分析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是不好的呢？

然而，转向关注行动者，有时也会使我们更加担忧。198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人们对于民主品质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不满。在近期 Chancel 和 Piketty 发表的文章中，他们对如今权力与财富集中程度高涨的现象发表看法，认为「21世纪初新殖民资本主义带来的不平等，与20世纪初的殖民资本主义可有得比！」此外，即便气候变迁严重，且人们对气候问题的原因早就取得共识，但是每次国际峰会都还是将解决方案一再推迟。如果这些问题确实存在，我们似乎不能再把问题归到「缺乏反身性」头上了。

于是，实践这个范畴，似乎落入了某种悖论中。当我们越强调能动性和行动者的反身性，似乎就越感觉我们的诉求在这个世界中被置若罔闻，而我们越试图转变这样的处境，就越感到不安（每一代社会学家在

他们自己的生活中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这样的情况纵然不是我们这些只能在学术领域中努力的社会理论家所造成,但还是促使我们重新省思这套实践概念的政治意义。我们如何不认为,我们正面对着强大的制度或结构呢?我们如何能否认这些由我们自身的能动性所建立的现实(制度、结构等),有着我们难以触及、甚至影响的规律?谁又能反身性地,要求更多相同的事物呢?

> 事物的逻辑

兜兜转转,我们似乎又得将视野放回社会结构上,着眼于结构明显有着的某种自主性、隐晦的运作机制,以及人们无意识的动机。然而,仅仅在理论上重申行动者与结构之间的对立、主张支持其中一方而排斥另一方,是错误的;因为这两者间的对立,并不仅是关于「逻辑的事物」,而涉及了「事物的逻辑」。行动者与结构之间一直存在的裂隙,并非是认识论错误所形成,而是社会现实本身运作的结果——这正是我们能够同时接受前述两种观点的原因。我们拥有主动性、反身性、动态性与多样性的能力,并且有着使用这些能力的慾望。奇妙的是,与此同时,我们面对着一个,与我们所拥有的能力站在对立面,且异化于我们的世界。很矛盾地,正是因为我们不断被要求应该主动创造自己的历史,才变得无法实现这点。我们的行动使我们变得被动;我们既是反身的,也是迟钝的。

马克思将这种奇特的逻辑称为「拜物教」(fetishism),Lukács 则称之为「物化」(reification)。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更进一步地回到过去,重新拾起他们版本的实践概念?我认为答案是:是的,但可能不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要保留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实践本质上所具有的、「需要被实现」的意涵。实践这个概念,不只是关于社会结构的内化与外化,也不只是关于人如何先天便具有能动性;而是应该将能动性理解为某种潜在的能力,只是其在现下环境中,受到特定条件的限制。这就是为什么行动者与结构之间的二元对立,没有办法借由在理论上放弃其中一者来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于现实中处理,在「事物的逻辑」中实现。在这里,实践与抗争、集体转变和解放是同义词。行动者和结构间的中介不是一个空壳词汇,而是一种需要在政治上实现的事情。

> 被动性与权力

采用此观点,并不代表我们就要完全放弃近期实践社会学的关注,只是换了一种理解方式。确实,如果我们无法认知到行动者具有积极、主动的能力,就可能在面对无可避免地佔据上风的「系统」时,率先剥夺了自己的权力。正如拉图曾经在谈论资本主

义时所言:「如果你一直失败并且不做出改变,这并不意味着你面对着一个不可战胜的怪物,而是意味着你喜欢、你享受,你喜爱被这个怪物打败。」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制度性因素某种程度上促使我们变得与笨蛋更接近一点,因为这也会导致同样的状况发生。如果每次面临制度的阻碍时,我们都能告诉自己:我仍然存在、行动着、抵抗并实践着,那么这些结构就会变得更脆弱,变得越来越缺乏政治力量——反之,我们诉求的越少,得到的也会越少,而再下次提出诉求的效果也就越差。

无论是否预设有一个全能的系统存在,我们最终都会陷入无力与失败的处境当中。问题从来就不在于结构或能动性本身,而在于我们误将它们视为静态的实体:前者是既存、且永远存在的,后者则微不足道。而实践的概念能给予我们的,正是承认、表达此对立,并为其带来转变。

我曾经说过,对解放运动而言特别关键的,是意识到即便人的行动与能动性是存在的,我们仍受制于超出个体掌握的结构逻辑——不预设人的能动性,并接受自己是被动地成为「机器中的齿轮」。但我们不能止步于此。我们需要抱持着积极的态度,承认个人身体在结构逻辑面前有其脆弱之处,然而这正巧凸显了个人身体拥有的物质力量——没有这些力量,结构也无法存续。以马克思的话来说:「以(资本的)系统化支配为基础的,是人和非人生命的生存(劳动)力量。」一旦这样的力量受到肯认,并且自发地组织起来,就可以对抗既有结构、为新的结构赋能。能动性于此重新显现——其不再以单一行动者行为的形式出现,而是成为了一种,一同处于脆弱状态的集体之生命力量展现。只有在意识到自己的被动性时,我们才能行动起来。实践之所以成为目标(becomes an end),正是因为我们承认它有终止(end)的可能。■

参考文献:

- Archer, M. (1982) "Morphogenesis Versus Structuration: On Combining Structure and Ac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3(4): 455-83.
- Boltanski, L. (2011) *On Critique: A Sociology of Emancip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Schatzki, T.R., Knorr Cetina, K., von Savigny, E. (eds.) (2000) *The Practice Turn in Contemporary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来信寄至:

Arthur Bueno

<arthur.bueno@uni-passau.de>

/Twitter: [@art_bueno](https://twitter.com/art_bueno)

> 实践反殖民社会理论

Sujata Patel, 退休教授, University of Hyderabad, 印度, 2021年 Kersten Hesselgren 访问教授, Umea University, 瑞典

反殖民社会理论从反殖民思想的批判性理解中取经, 这种思想通过反殖民社会运动在全世界发展和传播。反殖民思想在不同的面向上评估了殖民地上的阶级制度和宰制/霸权的建构, 也因此是对「在地」群体在抵抗殖民主义的角色和干预上的原—社会学分析。为了做到这一点, 反殖民思想定义了一种方法, 以驳斥在殖民地内使殖民统治落地深根的既定观念、原则和假定, 并厘清这种宰制/霸权知识在殖民国家发展方式的历史脉络。此外, 它假定殖民主义是一个历史分水岭, 是资本主义剥削人民、地区和领土的标志, 因此它开启了寻找新的认识论来理解殖民/帝国主义所定义的当代现代性。

基于反殖民思想的社会理论发展是一个晚近的现象, 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社会科学把关于殖民/帝国主义以及其与现代性间关系的讨论推到了边缘。然而, 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以来, 随着「社会学理论(们)」的标籤开始越来越多地被另一个标籤—「社会理论」所取代, 其与反殖民社会理论连结的观点已经出现了。这种变化是社会学在19世纪末的实证主义观点瓦解之后发生的, 这种观点评估规律性, 进行类似法律的分析, 并使用回归基础的变数模型来理解「社会」。同时一些学者采用诠释学或诠释和结构主义的分析, 而另一些学者则建议需要厘清该学科的历史脉络, 以理解社会学经典和名著在解释欧洲内部或外部构成的新现代性方面上是否相关?

> 以原有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来取代霸权主义的逻辑和思维

因此, 社会理论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以社会学为基础的, 对原—理论, 或在此之上的哲学反思, 以探索其本体—认识论的停泊处。社会理论的这种阐述也导致了社会学内部对「规范性」的接受(Chernilo和 Raza)。我认为, 反殖民社会理论是这些规范性趋势中的一种, 它对于知识、其领域以及其与资本主义和殖民/帝国主义停泊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拷问。它是一种方法论上的介入, 驳斥了宰制/霸权形式的逻辑和思维的使用; 同时寻找一种原始的本体论,

以创新的理解方式去认识和思考。因为它将宰制/霸权思想, 与资本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剥削和排除过程给连结起来; 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科学方法, 它是一种将知识建构过程的政治学理解, 所理论化而非仅仅是阐述它的方法论。因此, 它从社会学的角度去审视经验的、理论的以及组织各领域/学科的「科学无意识」, 以提出一个新的选择(Rutzou)。

有鉴于殖民主义从十六世纪开始在各地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导致了反殖民主义的政治斗争在许多不同的空间和地点发扬光大, 原—社会学的反殖民主义思想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而反殖民社会理论抑是。这些不同的方法论立场是: 原住民社会学、原民性和原住民方法论(Atal; Akiwowo; Smith)、内生性和内生性思想、外向性(Hountondji)、自主和独立社会学(Alatas)、底层理论、衍生性国族主义和殖民差异(Guha; Chatterjee)、殖民现代性(Barlow; Patel)、内部殖民主义(Martin)、权力的殖民性(Quijano)、边界思维和脱钩(Mignolo)、南方理论(Connell; de Souza Santos)、连结社会学(Bhambra)、以及后殖民社会学(Go)。毫无疑问, 这些不同的立场有其独特的属性, 但也标明了它们的最小公分母乃是当务之急。我认为这个最小公分母, 这些方法作为一个本体—认识论视角, 都隶属于反殖民社会理论。

> 接下来呢?

反殖民社会理论不仅为解构不同地域的宰制/霸权地位提出了方法论, 还由知识的全球分工脉络出发, 以新颖的方式制定了重构这些地域的步骤。它是一种战略, 为解构知识流通和再生产的制度化流动提供了方法。它的讨论有助于重新框架全球社会理论的碎片化领域, 并主张这些差异并不代表该领域的封闭。相反地, 上述观点及其各种代表都肯定了一种方法论假定, 「社会」的知识在意识型态上与殖民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相关, 并表达了作为宰制/霸权观点在殖民时空下的脉络。他们认为, 当代社会科学理论需要透过对于知识生产的政治理论进行调

>>

「反殖民社会理论以知识的全球分工脉络，为解构宰制／霸权地位提出了新颖的方法。」

节和筛选，而后理解殖民／帝国的地缘政治则是评估知识生产和现代性政治理论的先决条件。

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当代批判是建立一个反殖民观点的自体论起点。这意味着，第一，承认由「我」和「他者」所组成的，在欧洲中心主义二元结构中的权力公式。反殖民主义的学术研究点出了颠覆这一的方法，并找到一个新认识论的声音来定义「我」。这促使学者们设计新的方法来研究权力／知识政治学：Paulin Hountondji 的内生性，Ranjit Guha 的结构主义式档案解构，以及 Aníbal Quijano 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这种研究也导致了对于，殖民权力如何影响殖民地阶级制度的建构，所进行的分析。这可以从 Guha 对国族主义精英和中产阶级的区分，以及 Quijano 对于剥削是以阶级和种族来组织的此一理解上看以看出。第二，这些观点为时间／历史的线性理论以及其进化主义理论进行辩护使其免于改变。随着殖民主义的出现，人们认为认识论上的断裂出现了，历史需要从这里开始。因此，大多数在殖民地区发表的反殖民现代性理论都对殖民／帝国的空间连结进行评估，这些连结组织了商品、想法、意识形态和知识领域在世界的大都市、半边陲地区和边陲地区之间的流动。

> 审视欧洲中心主义的属性

更特别的是，当代反殖民社会理论综合运用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依赖理论的解构、世界体系分析以及批判性马克思主义历史社会学等方法论上的策略，对欧洲中心主义的特质进行审视。因此，它以各种方式论证了宰制／霸权的社会科学(a)是国

族中心主义的，因为它们投射了欧洲现代性经验的优越感；(b)使欧洲现代性的历史和文化模式成为普世价值，从而促进了路径依赖性；(c)有时部分重构，有时抹去非欧洲历史，透过包括种族、种姓、性别主义和其他范畴的阶级制度的二元对立来重现它，(d)在社会科学之间划分和创造边界；以及(e)促进以东方主义的方式看待非欧洲世界。

反殖民社会理论肯定了描绘脉络、时间和空间的必要性，以组织研究问题和方法，去了解是甚么社会进程、机制和事件，影响了殖民地和殖民世界中的行动和行动者的。这种社会理论有助于研究如何建立关于现代性的务实性理论，确认其相关性，调查经验性资料，并将它们应用以进行实证研究。作为对社会学的哲学假定调查，反殖民社会理论可以成为当代全球社会学的基础。■

來信寄至：

Sujata Patel

<patel.sujata09@gmail.com>

> 社会理论经典下的女性

Luna Ribeiro Campos, State University of Campinas 和 Verônica Toste Daflon, Federal Fluminense University, 巴西



来源:Vitória Gonzalez 创作的影像蒙太奇,2023。

1838年, Harriet Martineau 正为了创造社会「安全概论」(safe generalizations)的法则进行辩护。在 Émile Durkheim 的《社会学方法论》发表前近六十年, Martineau 发表了《如何观察道德和礼仪》,这是一部精美作品,对于人际关系的知识生产所进行的认识论挑战。

Martineau 将社会想像成一个领域,其中制度、物质生活、符号、情感、身体和人口因素交织在一起。像她的前辈 Mary Wollstonecraft 一样,她认为家庭道德和政治是「在实践中不可分割的」,科学家只能为了分析的目的将公私领域分开。总而言之, Martineau 是一位认知到社会生活性别基础的理论家。

在她去世后的几年里, Martineau 其他先驱者,如 Flora Tristan、Anna Julia Cooper、Marianne Weber、Beatrice Potter Webb、Jane Addams、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以及 Alexandra Kollontai, 都变得默默无闻。来自英欧背景之外的女性参与19世纪的公共辩论和出版市场也被遗忘,例如印度作家 Pandita Ramabai 和南非作家 Olive Schreiner。

这些女性的发展轨迹非常多元:有些人深入地参与了社会学的建构,而另一些人并不一定在乎创

立一门学科,但提出了我们现在理解为社会学的观点。尽管存在着差异,这些女性展现了,社会学的历史不是线性的,而是有多重起源,且比我们通常所认识到的有更多的主题和地理多样性。

社会学的制度化和阳刚化是相辅相成的。赋予 Karl Marx、Émile Durkheim 和 Max Weber 经典地位的学术和政治争论,抹杀了女性在社会学建构中的存在,并使非欧陆的资料来源沉默。因此,许多性别化的调查领域被边缘化,限制了我们的社会学想像力。正如 Dorothy Smith 所指出的,日常世界是一个向社会学调查开放的问题。因此,那些被忽视的议题,例如家庭、婚姻、性和再生产;不仅仅是私人问题,而是与社会学有关的问题。

> 妇女促成的社会学关键议题

由于妇女在古典社会学中的存在从未被系统地承认,因此描绘她们的贡献始终是一个挑战。对她们作品的一无所知、缺乏新的出版和翻译,以及具有批判性视角的研究,都助长了一种说法;即在19世纪没有妇女思考社会问题。这种对妇女在社会学历史和教学中贡献的漠视,影响了对该学科核心概念、理论和方法的定义。

例如,在19世纪上半叶,秘鲁裔法国思想家 Flora Tristan 分析了工人阶级妇女在家庭和工作环境中的特殊状况。可以说,她在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研究中使用参与式观察的方法论,比 Friedrich Engels 的书还要早几年出版。此外,她了解到压迫关系不仅建立在法律机制上,而且镶嵌在日常生活的结构与制度中,例如教堂和家庭。

Pandita Ramabai 则写了许多作品,其中她记录了在印度妇女在宗教、种姓、不平等和殖民主义交会下的复杂处境。Ramabai 从理论上阐述了种姓间的亲密关系、种姓的内婚形式、日常生活的仪式化、以及对妇女的控制。她指出了种姓与嫁妆、寡妇待遇、甚至杀害女婴等实践相关的机制。她的作品揭示了社会群体间的性别化特征以及划界。

>>

到十九世纪末，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的作品被广泛阅读。Gilman 是美国社会学协会的会员，她批评了维多利亚时代对母性和女性持家的崇拜。在她的作品中，她努力地厘清家庭和住宅的历史脉络，将社会确定为家庭、国家和市场之间紧密的关系网路，并形成一個高度相互依赖的结构。

至于德国人 Marianne Weber，她写了九本书和几十篇论文，其中讨论了法律、婚姻、母性、女性自主权和父权宰制等议题。Marianne 以一种类似于历史社会学方法论的方式比较了不同社会中的有关婚姻的法律协议。为挑战婚姻中的从属性，她为伴侣关系的建立和法律改革进行辩护，认为这是保障女性个体性的一种方式。

在同一时期，南非思想家 Olive Schreiner 在有关南非建国可能性的争论上积极地发声。她对英国在南非领土上的殖民主义行动抱持批判态度，并谴责帝国主义者发动对矿产资源和原住民的剥削。Schreiner 在国族形成，以及其与民族、领土、种族和性别间的矛盾关系上，展现出锐利的目光。

最后，在二十世纪初，Ercília Nogueira Cobra 透过观察，性以及妇女身体被控制的方式，提出了对巴西性伦理的批判。Cobra 展示了荣誉准则，例如要求妇女在婚前保持处女身份，是如何与剥夺妇女的公民权利联系起来的。因此，她展示了法律制度如何影响社会关系，指出对性的控制可以成为权力关系施展的基础。

通过认真看待这些妇女的文本，我们试图对被理解为社会生活基本要素的性别范畴进行分析。我们的想法是要去了解这些由妇女生产的理论是否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诸如秩序、行动和社会变革，以及工作、权力、社会连带和不平等的概念。

> 思考经典时的当代挑战

在当代社会学中，对社会学经典的地位存在争议。像 Raewyn Connell 和 Patricia Hill Collins 这样的作者就认为，面对日益复杂和全球化的社会学，经典的概念本身并不是永续的。然而，国际社会学群仍为了专业化的目的持续依赖经典作家。

无论我们怎么想，使新旧经典形成的社会过程依然在进行。有资格被称为「伟大理论」的东西通常是作为古典社会学二律背反的合题或超越而被提出的。因此，古典和当代理论始终保持着一种基本的关系，这种关系似乎远远没有到此为止的一天。

为了使性别不再是一个次领域甚至是一个自给自足的领域（自嗨同温层？），并进入社会学的核心，有必要将女性作者纳入古典社会学的圈子，使她们成为教科书的引用文献。近年来，已经采取了很好的行动，比如 Patricia Madoo Lengermann 和 Jill Niebrugge-Brantley、Kate Reed、Mary Jo Deegan 以及 Lynn McDonald 的作品。如果我们继续在生产带有女性偏见的欧洲中心主义观点，这将会是毫无意义的。正如 Alatas 和 Sinha 所提及的那样，超越经典的社会学理论是需要朝欧洲以外的地方看一看的。

在巴西，我们出版了《社会学先驱：18和19世纪的知识女性》([Pioneiras da Sociologia: Mulheres intelectuais nos séculos XVIII e XIX](#))一书，为这场辩论做出了贡献。该电子书目前只有葡萄牙语版本，汇集了16位来自不同背景的女作家，并建议以教学的形式介绍她们，这在国内是史无前例的。

将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女性作家——无论是否为经典——一同纳入思考脉络中，将是历史与社会学的挑战。通过比较，可以对来自全球北方的互惠普遍主义理论进行相对化和批判，揭示出独特的社会历史配置，同时也为分析标志着现代世界的全球宏观社会学进程提供线索。重新思考社会学典籍并使其更具包容性，是等待新一代的任务。■

我们要感谢 Fundação de Amparo à Pesquisa do Estado do Rio de Janeiro 对我们研究项目的支持，以及致力于推动科学知识的发展和培养巴西的学术成就。

來信寄至：

Luna Ribeiro Campos

<lunaribeirocampos@gmail.com>

Verônica Toste Daflon

<veronicatoste@gmail.com>

/ Twitter: [@vetoste](#)

> 开放取用、掠夺性期刊或订阅制期刊

Sujata Patel, 退休教授, University of Hyderabad, 印度, 以及 2021年 Kersten Hesselgren 访问教授, Umea University, 瑞典

来源: Stanislau Kondratiev, Pexels



最近有位来自欧陆大学的同事向我邀稿, 文章将刊登在其编辑的英语社会学理论开放期刊的专号中。虽然我从未听过这份期刊, 但我立刻就答应了, 因为这意味着如果文章(在通过审查)发表后, 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潜在读者, 或许这会有助于克服今日专业知识都由订阅与付费制期刊所主导的潮流而产生的瓶颈。众所周知, 订阅或付费期刊并不受到绝大多数的政府、大学、研究机构或研究基金所补贴, 因此也产生了跨国与全球学术群体在资讯与知识上触及量能的限制与隔阂。惟上述针对期刊所产生质疑带领本人发现学术社群是如何看待开放取用; 即我多数的同事认为开放取用制期刊大部分是掠夺性期刊, 订阅制期刊反而比较专业。令我困惑的是: 当开放取用允诺了免付费的学术发行, 甚至鼓励学术社群间的交流与对话时, 为什么我的同事会有这样的想法?

> 乐观的开始

开放取用(open access, OA)运动起自1990年代当网路成为通讯的代名词, 以及重新定义了过往

以印刷物为基础的出版业, 此一运动尔后也变得愈发重要。2001年, 布达佩斯开放取用宣言(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 BOAI)定义了OA作为一个免费及经过同侪审查的学术研究, 「在网路上允许任何使用者阅读、下载、复制、发布、印制、搜寻或连结全文, 爬梳参考资料、档案传递, 或用于其他合法用途, 除了与网路途径本身密不可分的人士外, 没有任何财务、法律或技术的壁垒」。BOAI也指出所有文章的智慧财产权皆归作者所有, 这个定义也影响了创用CC授权条款。

当开放取用期刊逐年稳定的增加, 期望能降低每篇文章的出版费用, 如最终将会不再支出印刷及稿费。透过这样的引导, 期望未来绝大多数的期刊都能成为OA期刊。

> 掠夺索赔

然而, 微风仍吹不皱一池春水。近期的报告评估中, 在2013年仍仅有25%的出版为OA期刊。为何这场运动并没有捕捉到所有学者对于期刊的想像? 其中

>>

一个假设是多数的 OA 期刊收取处理费，而因此是掠夺性期刊：「只要付钱，任何文章都可以刊登」。

将这种期刊冠上「掠夺性」之名，首先是自由主义学者 Jeffrey Beall 自2010年起就公开抵制 OA，其曾在网路上罗列了一份[掠夺性期刊的清单](#)。对Beall来说：「掠夺性出版者利用（作者支付的）金钱办立开放取用模式，且试图增加收入，时常忘记了合宜同侪审查的这个前提」。

较新的文献显示Beall并不是唯一一个抵制OA的学者。此外，大型出版商也与学会和其游说者进行利益交换，试图提倡 OA 对同侪审查体系来说很危险这个点子。其论点为做出好研究的关键基础是订阅制期刊，特别是这些由学会、专业协会和研究机构等结盟而体制化的同侪审查体系。尽管意识到其试图牟取利益的商业模式，他们还是坚持其也与相关机构（如国际社会学学会的预算大部分仰赖出版版税）分享了收入，因此提倡知识生产既是专业且全球性的。此外，其认为自身也保护了作者与研究机构的智慧财产权。

因此，绝大多数的学会和专业学会也都支持大型出版商，反过来说这些出版商强行介入公共领域以确保他们期刊的权利受到保护，且抵制任何形式的开放取用。例如，在2012年一些出版商（Oxford、Cambridge以及Taylor and Francis等等）因为德里大学的影印店贩售复印本及散页而在印度法院提起诉讼，然大学与高等法院同样支持影印店，诉讼后来也不成立。

> 远离制度二元分立的需求

掠夺性期刊无疑是存在的。与印度、伊朗相同，拥有最多此类期刊的美国和日本，其学术监察机构和大学并不认可透过在这些期刊发表的文章作为学术绩效评估。然而，所有的OA期刊都真的纯然是掠夺性期刊吗？针对Beall所罗列期刊名单的[近期研究](#)显示，其所认为OA期刊里最主要的缺失，在订阅制期刊中也看得到，此外也并不是所有的OA期刊都会收取文章处理费。开放取用期刊指南指出目前约有超过18000种以上的OA期刊可在网路上取得，约有13000种并不收取处理费。同一个研究中，作者也提及与其争论 OA 与订阅制期刊的二分，更重要的是提出更多值得反思的问题，例如如何建立一个较好的审稿方式，并且将其制度化，以及如何使得这样的制度在OA与订阅制期刊中公开透明地落实。另外，同等重要的是，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是否也能够完善地执行。

当然现在需要更多此一相关议题的阐发，我的论点是出版业是知识生态系统的一部分，透过不同语言社群之间知识生产与流通的分歧而能蓬勃发展，而出版业也充实了这个体系，并将之制度化。二战后，当大学与研究机构在全球北方并横跨世界蓬勃发展之时，这个生态系统也随之孕育而生。在这样的扩张地下，有个观点认为由全球北方所制造的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知识领域是具有普遍性的，并且值得世界各地的学术社群效法，并加以制度化。

这个生态系统订下了由欧美大学、研究机构与实验室肩负知识生产的角色，而知识是透过私营期刊、书籍的出版与发行来进行传播。很快地，这些大学与研究机构变成这些学术期刊与书籍的主要消费者，从而在他们和私人出版社之间建立了共生关系，也难怪这些在英美的出版商将其产品分类比做国际市场的一部分，而其他地区的知识产品则是照区域排序。近来借着大学针对教师的表现进行相当严格的评鑑，这个生态系统有着显着的成长，并给予了订阅制期刊更强大的合法性。开放取用运动颠覆了这个生态系统，因此对所有与它有利关系的相关人士构成了威胁。

然而，世界各地想要发表或阅读新兴研究的学者将何去何从？同时，世界各地那些旨在鼓励独创内容、新颖写作风格和不同评论的出版品又将如何呢？就如同那些渴求全球对话的学者们，我希望我们可以就这个课题，开启我们之间的讨论。■

來信寄至：

Sujata Patel

<patel.sujata09@gmail.com>

> 为了给印度比哈尔邦更好的寻求健康行为

Aditya Raj 和 Papia Raj,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atna, 印度

来源: Anna Shvets, Pexels



疫情造成的行为改变，成为了社区中控制病毒传播的规范。政府数度下令封锁边境并宣导民众保持社交距离、自我隔离、居家隔离、在公共空间佩戴口罩和手套和勤洗手等习惯。尽管付出了这些努力，印度政府仍无法有效控制疫情；正如大众媒体的报导，大部分人并没有遵守政府的规劝，更重要的是，也不愿意进行病毒检测。并且，就算被测出阳性，人们直到情况变严峻前，都不愿意承认自己已经感染了病毒。由于公共卫生基础建设的匮乏，比哈尔邦作为一个未开发省份的状况更为严峻。这显示了社区中个人参与寻求健康行为 (HSB) 的重要性。

HSB的概念是透过社区中的成员所进行一系列预防和补救的行为以改善被发现的疾病或维持良好

的健康状态。因此HSB构成了人们所做出的「健康选择」，这些行为因地理上空间和社群的不一而有所不同。为了改善现况，最重要的是了解阻碍人们采取渐进式HSB的因素，同样也须了解人们会因为什么样的契机而有意愿发展正向的HSB。尽管HSB是公共卫生中重要的一环，目前在印度，特别是在比哈尔邦，仍没有针对了解阻碍和促进HSB因素的研究。

> 从比哈尔邦断代研究中所吸取的经验

我们在巴哈尔邦的市区巴特纳进行了跨区研究，这个地方拥有全印度最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我们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并收集了2021年四月到七月这段疫情期间的主要数据。根据我们的数据分析发现，有43%的人表示他们曾经确诊 Covid-19，34% 的人表

>>

示家中成员有一人或超过一人有确诊的经验，并且23%的人有自己和家人同样都有确诊的状况。确诊的人口有明显的性别差距：61%的人为男性，其余31%为女性。就生理上而言，女性比男性更加强壮，在类似的情境下，女性有更高的机会成功抵抗和生存。另外，家庭内部的社会结构和性别动态显示了家中男性的健康总被排在第一顺位，或许当女性有症状时，他们根本没有快筛。

除了性别之外，在有确诊的群体中年龄落在25至29岁的人有四成，代表越有行动能力、越常暴露在户外环境的人同样也越容易受到感染。不幸的是，部分人家中有成员因为疫情而死亡。在我们的研究中，多数的死亡案例(88%)皆住在多层建筑中，仅有12%的比例住在独立私人建筑。同样我们也观察到，67%的死亡人口生前从事服务业、26%为自僱人士，其他并未透露职业。无论来自何种社会背景，所有受访者都不愿意做病毒的检测。当问到他们如何得知自己确诊时，多数人表示他们有出现相关症状，因此判定自己感染了病毒。当问到他们为何不透过快筛来确认自己是否为阳性时，他们的回复不一，包含缺乏检测设施知识(27%)、没有得到医护人员建议(12%)，和最重要的因素，害怕因为确诊带来的社会污名(59%)。

由于病床和其他医疗资源的缺乏，在状况变得严峻之前，人们偏好待在家中养病。资讯和资源取得的不足是寻求医疗协助的主要障碍，也是阻碍HSB在社区内发展的原因。因此许多人选择服用居家常备药(大约27%)，部分透过电话与医生谘询(16%)，少数前往诊所(11%)，相对多数的比例(46%)仅依靠朋友、家人和，想当然，数位媒体的资讯。

确诊者会被建议进行自我和居家隔离，但这样的行为在印度社会并非常态。事实上，感染者因为害怕随之而来的污名而不愿向社区透露他们的状态。

根据我们的分析，我们认为尽管人们已经准备好遵守HSB的规范以应对 Covid-19，他们同时也受到资讯不足带来的影响，这是HSB最大的阻碍。因为恐惧和无知，人们不愿意在生病初期就寻求医疗协助。因此眼下的当务之急便是提供卫生教育以促进HSB，尤其是在像比哈尔邦这样未开发的地区。

> 回顾

Covid-19仍持续对公共健康造成威胁，相关的卫教实作应该以永续、被社区所接受为目标。根据我们研究的发现，我们发现社会急需透过卫生教育进行的社会干预以在社区内发展HSB，并且这件事是必须被实施的。将健康教育作为卫生政策的一环，此一综合方法将有助于社区中行为的改变并有效促进健康。

我们近期的延伸研究显示在Covid-19之后，人们开始更多的关注卫生和健康相关实作。卫教的加强和对健康交流的投资使人们发展出对HSB新的社会理解，这将促进一连串的健康提倡过程。这将使人们有能力面对自身的健康问题，并且克服现有的健康差异。因此，健康教育是当务之急。■

來信寄至：

Aditya Raj

<aditya.raj@iitp.ac.in>

/ Twitter: [@drAdityaRaj](https://twitter.com/drAdityaRaj)

Papia Raj

<praj@iitp.ac.in>

> 西班牙的心理健康：社会学如何重要

Sigita Doblyté · University of Oviedo · 西班牙



来源: Adrian Swancar · Unsplash

目前与心理健康有关的政策，大多被归入医疗范畴当中，属于国家体制的一环；同时，心理健康也与个人文化、社会关系与人格息息相关，是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我认为，社会学可以很好地协助人们理解心理健康与相关困扰。如今的世界正面临许多因文化再生产以及社会整合而产生的问题，而人们也因失去文化定位、异化等而产生心理健康困扰。因此，我们应该在处理心理健康议题时赋予社会学更重要的角色。虽然这篇文章中，我的论点将以西班牙为中心，不过本文应该也会让其他国家的读者产生共鸣。

过去一年中，西班牙的心理疾病议题，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政治人物、记者和倡议者都提到，根据国内外统计资料，西班牙的心理健康状况有恶化的趋势——自杀死亡率不断提升、抗忧郁药物使用量过去20年间增长三倍，为欧洲成长幅度最高的国

家之一、抗焦虑药物使用量也是全球最多。2022年，一份针对西班牙公部门员工心理健康的调查，试图解释上述现象的原因：近一半的人坦言，自己依赖心理药物来缓解工作焦虑。

这些统计资料反映出心理健康议题不只是个人问题，也涉及社会过程。然而，媒体仍旧将镜头交给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而不是社会学家。即便心理学和精神医学在协助个体面对心理困扰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相关人士经常受到生物医学模型的世界观限制，在处理此类情况时将问题去脉络并个人化。举例来说，医学专业人士给出的结论，常常只是：我们应该增设更多心理医疗资源——这当然也很重要，但我觉得应该会有其他更好的解决办法。

> 文化与自我价值

文化确定性分为公共的与个人的，前者的再生产是透过社会关系和制度进行，后者则借由社会化的过程实现，以哈伯马斯(1987)的话来说，我们的期望、决策与行动都是为了确保自己能拥有「足够的知识一致性，以应对日常实践」。在新自由主义的文化之下，强调竞争、物质成功和特定生活方式的自我脚本越来越多(Lamont, 2019)，人们定义「好的生活」的方式也走向同质化，生产表现和消费变得比其他社会价值还要重要。

在这样的脚本下，那些虚幻的目标，被描述成是人人可以借由努力工作实现的。这又导致了「赢家」和「输家」的分类——赢家努力工作并追求自我，而输家则缺乏这种能力。然而，即便努力付出，这些自我价值的衡量标准，并不适用于每个人。在西班牙，出生在富裕家庭，就等于是取得了庞大的优势。相较之下，如果生在贫困家庭，不管多努力学习、工作，成功的机会比起前者便要低得多。

这些以物质成功为核心的文化脚本，早已内化至人们心中，大多数人也确实根据这些脚本来构筑

>>

对未来的想像。其中，许多人并没有机会在现实生活中，过上想像中的美好人生，却又发现有些比较幸运的人，可以轻松地生活。这种想像和现实之间的落差，可能会引发某种因文化而生的情绪，如危机、悲伤、愤怒或羞耻。我认为，失去对未来的信念，是通往不幸的最直接途径之一。

> 工作与社会关系

除了物质上的匮乏会带来痛苦，社会学指出，人会因其职位而产生痛苦。举例来说，一位年轻学者多年来努力求学、认真研究，而这段期间，有人承诺他只要努力，一定会有安稳的工作，也会受到其他人肯认；最终，这位学者却无法找到足够「体面」的工作。即便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他也会痛苦。西班牙的调查显示，除了薪资不平等之外，工作相关变项也与心理困扰有关系，例如认为工作缺乏意义、没有目标等。

若能借由制度在工作环境中提升员工的自主权、尊严与受到的肯认，并增加组织成员间甚至组织与组织外的人之间的团结程度、使其付出能获得奖励，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会缩短，员工的幸福指数也会提高。工作变得有意义，也会促进生活世界的社会整合。然而在西班牙，员工的自主权、尊严与受到的肯认低落，工作环境明显恶化，心理困扰随之增加，这些现象已经引发了不少关注。

不过，非正式社会网路的团结，有助于缓解因工作而引发的困扰，特别是在家庭文化强烈，但非家庭网路较弱的南欧社会中。虽然这样说，但是在西班牙，不管是家庭网路还是非家庭网路，所有社会关系的功能都下降了(Ayala Cañón 等, 2022)。这件事在疫情爆发前就已经发生，随着疫情加剧，情况又变得更糟：人们与朋友和亲人见面的频率降低，社会和情感支持减少，感到更孤单了。

由上可知，文化领域中的困扰，将导致人们失去文化定位，而社会关系的中断——无论是工作关系

还是非正式社会关系——则导致个体间更为疏离。这又回过头来造成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长出的期望，和生活中的现实情况不符合，其中又有些人的生活比其他人更难以适应，最后产生了心理疾病。

> 关于体制

最后还是得说，虽然这篇文章关注生活世界，不过社会学还是应该以将社会的两个层面连结为目标，其中，体制及其经济、政治—官僚领域「必须满足社会文化生活世界的维持条件」(哈伯马斯, 1987)。虽然说心理健康服务确实能减轻个人的痛苦，但这已经超出其范围了。不过，在目前的情况下，个人还是得回到异化、缺乏意义的生活世界中。

如果不扩大价值体系的评价标准，让更多人能感觉自己有价值；如果不改善劳动关系和工作机会，使人们能在工作当中得付出得到回报；如果不提倡住房、家庭等社会政策，以促进、传递特定的价值秩序——如果不改善那么这些在西班牙相对薄弱的因素，那么前述的困境便会持续。意即，在面对异化、无意义的生活世界之时，能求助的对象又只有治标不治本的心理健康照护系统，是一个恶性循环。

作为社会学家，我们有能力解释这些过程，并将其呈现在台面上。过去的社会学研究即便涉及心理健康、疾病，往往侷限于医学社会学，而打学科领域的藩篱，在研究此类主题时将其他领域如文化或经济社会学，对知识和实践来说是极为有帮助的。我主张，是时候加强不同社会学子学科之间的对话了。■

参考文献：

- Ayala Cañón, L., Laparra Navarro, M. and Rodríguez Cabrero, G. (eds.) (2022) *Evolución de la cohesión social y consecuencias de la COVID-19 en España*. Madrid: Fundación FOESSA.
- Habermas, J. (1987)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Life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Vol. 2.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Lamont, M. (2019) "From 'having' to 'being': self-worth and the current crisis of American societ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70(3): 660-707.

來信寄至：

Sigita Doblyté

<doblytesigita@uniovi.es>

> 透过识别隐性暴力 扩展人权论述

Priyadarshini Bhattacharya · 印度政府行政服务官员



来源：巴西艺术家和政治学家 Ribs (twitter.com/o_ribs 和 instagram.com/o_ribs) 为社会理论和拉丁美洲研究中心社会运动观察站创作的插图「我们希望彼此活着」。
来源：Ribs, 2021。

人权范式是一种以深度同理心看待世界的方式，它建立在人类生命是有价值且具尊严和意义的基本预设之上。这个范式因为历史上男女所遭受的暴行经验，而有了结构上的改变。然而，如同每个范式，它起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在这个情况下，主导着法律实证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知识潮流，优先考虑将客观经验主义和脱离实体个体作为主题。此时正是进一步丰富和扩展人权范式轮廓的时候，透过认清交织性和情境知识在理解性别暴力的叠积性本质的价值。任何僵化的迹象都必须促使我们发展出一个更细致、且针对具体情况的国际人权习惯法，以关注隐蔽的文化暴力和根

>>

深蒂固的偏见，这些偏见使这类暴力下的倖存者的主观诠释受到限制和噤声。

> 人权论述未能解决的性别暴力难题

本文阐述了在解决性别暴力时，现有人权论述以及相关社会法律文书的不足，特别是当性别暴力具备潜伏的性质，使得这些事件发生在「平时时期」。再者，扩大人权论述的必要性在于辨认出暴力的不同形式，它们往往超出了可量化的经验范围，但仍旧是潜在且根深蒂固的暴力，因此需要不同的工具来衡量。最后，呼吁人权捍卫者和法律机构将注意力转移到日常化的潜在性别暴力形式，同时培养必要的能力和责任感以提供救济。

若将性别暴力视作一个光谱或连续体，它横跨了壮观和平凡、跨越了奇异和平庸。在人权框架下所提及的性别暴力，包含随机杀人、将性暴力视作战争策略、人口贩卖和其他类似的残暴行为，由于它们发生在冲突地区，而引起了国际社会和民众的愤怒。然而，象征性(Bourdieu, 1970)和潜意识暴力的概念作为一种工具，带着我们将目光从严重且明显的暴力形式转至低强度、隐晦的暴力「运作形式」上；这类的暴力往往在「平时时期」发生，但会在冲突或危急时期达到临界点。[Scheper-Hughes](#) 和 [Bourgois](#) 在他们的研究中使用「日常暴力」一词，来强调社会对性别暴力倖存者因体制下的进程和对话而遭到的伤害的漠视。

当代的状况使我们必须面对暴力的复杂性，特别是在私人领域和政治领域间界线越加模糊下的性别暴力叠迹性(palimpsestic)。在「平时时期」发生的较为隐晦的性别暴力，因为不像外显的暴力那般容易衡量，所以较不容易受到政策层面或法律层面的关注。无法被确切量化的部分经常被噤声或遗忘，并且被排除在讨论和辩论之外。正如[Gayatri Spivak](#) 所说，量化限制了我们所能看到的，也抹去那些「无法被定义」的部分。

> 使日常暴力被看见的女权认识论与其背景

实证主义在追求科学性的过程中，一直在试图发展可量化的指标。人权论述通常将重点放在战争地区中所发生的有形伤害和外显暴力，透过普遍性和发生率严谨的估量一个地区所受到的破坏和反常行径。因为历史上，人权范式与实证主义方法论、新自由主义的量化特性之间紧密的关系，使它无可避免的倾向忽略丰富且详尽的论述。由此导致的「稠密描述」或「反论述」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经验中，要求以本体论打破狭隘的经验主义，并转向解释女

权主义立场，它承认被侵犯者主观经验的有效性，且允许他们对自己的经验进行文字化、分类，从而进行衡量。[Cecilia Menjívar](#) 以他敏锐的洞察力撰写了瓜地马拉东部的民族志，记录了拉帝纳女性遭受的隐晦暴力的具体经历，生活在每天被贬低、羞辱和蔑视的微观环境下，导致杀害女性的可怕行径出现。Menjívar 通过记录女性对自己痛苦常规化 *aguantar* 的观察，从常态的角落里找回了文化上被视为「习以为常」的暴力。

透过承认特定认识主体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女性主义立场知识论为那些一直以来「缺席的主体」创造出空间，并取得她们的「缺席经验」。这样的方法论促使利害关系人更容易被看见，他们不再被量化系统排除在外，并且也得到了知识权威。以法庭程序或审理的形式主义为例，当受虐待的倖存者在法律代理人冷静的态度下被要求有条理的描述是否存在任何「证据」证明所遭受到的暴力行为，考虑到她的行为和现状所表明的明显「同意」。人权立场应刚进一步探究，并且以女性经历的「隐性说服」的特定范畴为背景，其中最无情的例子便是单纯由「事物的秩序」所施加的说服。

当司法机构和法律执行者以及「象征权力」的拥护者具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并以未经反思的预设立场来作出「裁决」时，不公正就会出现无法辨识、无法表达并成为制度化的现象。

> 改变社会现实的新方法

要求社会去接受「无法感知的事物」并不脱离实际和法律上的复杂性，更不用说道德困境了。在这方面，女性主义研究经常忽略了象征性暴力，将其视为一个过于模糊且难以辨别的类别。然而，人权的法定化永远不是一个全面且详尽的过程，而是需要以不同的测量工具，并且不断受到持续变化的社会力量 and 实证发现的启发而进行调整。

朝着将日常象征性暴力法定化并进行制裁此方向迈进的基础是[贝伦公约](#)和MESECVI示范法，它们都在努力的实现此目标。公约的第六条承认了女性的「免受歧视的权利，免于受到因为文化刻板印象和惯例而被视为低人一等、被指定固定的行为模式的权利」。

在南亚地区一个有力的例子是与父权体制下「品德」和相对应的「耻辱」相关的「品德犯罪」，这控制、引导和规范着女性的性行为。然而，针对那些涉及对女性及其家庭进行的社会排斥，并导致他们实际上「社会性死亡」的低强度暴力形式，很少受到任

>>

何提及或国家明确的谴责。事实上，这样的行为是合法的，且法律代理人又进一步压制了它们的能见性。

> 对人权进一步的承诺

被隐藏的暴力形式有效地被现有的意识形态叙事、习俗和制度所内化和支持。人权论述必须关注那些不明目张胆，而透过日常顺从的方式产生的暴力，这样型态的暴力是由深植文化的意识形态和历史受到支持的「[计划](#)」所导致的。

这些潜在形式的暴力藏在「正常」社会实践的表面之下，它们因为可能造成隐性的伤害，而需要从规范性的空间、实践、制度的过程和互动中被提取出来。因此，对人权进一步的承诺需要以一种关注妇女在特定文化背景中所经历的非对称性别关系中的隶属和政治的嵌入性语言来体现。这些文化背景往往合法化惯性和再生产，从而使日常再现变得正常化。所以，这些未被宣扬出的「轻微」不公正行为需要不同的衡量工具。

反身性和批判文化分析的视角必须完善人权论述，以认知到日常生活的平凡性将可以孕育强大的性别暴力形式。鄂兰的「[邪恶的平庸](#)」只是提醒我们「[历史上最不正义的时日](#)」并不是由极端份子或精神病患所造成的，而是由普通人——可能是你和我——因为我们接受并顺从了现有的秩序。沈默和接纳确实是再生产不平等权力关系的有效机制。

一个不成熟的人权论述可以反映出的，不仅是国家的沈默，也是[集体良心的沈默](#)。女性主义的认识论和检视「日常暴力」的工具可能为人权范式提供另一个视角，更能容纳我们「认识英雄」的「更深沈」的沈默和被压抑但被回朔的声音，他们必须从狭隘的经验主义的经验压迫中崛起。将人权重新定位为认同政治——通过倾听的方式，使日常被隐藏的不正义被看见——将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它将有助于为那些带着无形伤口的叙事者进行集体疗癒。■

來信寄至：

Priyadarshini Bhattacharya

<priyadarshini.bhattacharya@gmail.com>

/ Twitter: [@BhattacharyaIAS](https://twitter.com/BhattacharyaIAS)

> 由 Khaldun 观点谈俄罗斯侵乌

Ahmed M. Abozaid,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英国



来源: Vitoria Gonzalez 创作的影像蒙太奇, 2023。

穆 斯林学者、政治家 Ibn Khaldun (1332-1406) 已经在全世界的社会科学领域中受到关注。他的跨学科研究为经济学、金融学、城市研究、人文地理学、历史学、政治理论、冲突研究、哲学和国际关系等领域贡献良多，而这些仅是其成就的冰山一角。他的著作《al-Muqaddimah / 前言》和《Kitbal-‘Ibar / Ibn Khaldun 的历史》收录于 Barthélemy d’Herbelot 的《Bibliothèque orientale》一书中，于1697年以法语在西方出版。如今，Ibn Khaldun 的作品已被翻译成许多语言，多位学者更将他视为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

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战争全面升级时，我正在撰写一篇以 Ibn Khaldun 和国家暴力研究为主题的博士论文。身为政治学家，再加上我的乌克兰伴侣和家人都身在 Kyiv，这次的暴力事件对我来说的冲击很大。我跟很多人一样，仍在尝试理解这个新的、充满敌意的现实世界。对于人们——尤其是所谓的「西方」专家——总是将战争理解得太过简化、解读得不够深入，我常感到沮丧。在阅读了 Ibn Khaldun 的著作后，我立刻理解了侵略的动态性，以及俄罗斯政权对乌克兰实施的国家暴力有多么严重。我

将在这篇文章中与你们分享这些思绪，并强调 Ibn Khaldun 的思想对于解释当今迫切的全球社会政治困境如何重要。

> 由 Khaldun 观点出发

原则上来说，许多全球政治冲突的源头，是17世纪以来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随之而生的国家体系。在两者的形成过程中，许多问题衍生，并从未被处理。从 Khaldun 的角度来看，若着眼于社会政治与社会经济的结构，便能从中观察到「asabiyya」（统治菁英）具有的特性，以及权力结构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形成——特别是这些结构如何被特定的暴力和压迫巩固，以维护统治精英的权力和支配地位、控制生产手段并垄断暴力。这些概念将帮助我们理解，国家向外部、内部发动暴力的动机与目的，即是协助统治菁英获得 / 保持政治权力。借着重新关注 Khaldun 对权力结构形成的分析，我们得以更好地理解当今全球政治的治理与正当性危机，并厘清自由民主何以走向军事暴政、威权主义、君主制政权，了解大国间如何走向竞争。这番思考也使我开始更关注过去发生的事情，并意识到如今的国际体系中的政治与法律结构，具有现代和前现代的混合特性。

>>

Khaldun的观点关注特定王朝中佔据支配地位的集团、爱国主义、寡头统治等势力如何生生不息，并指出团结的社会团体为了保护其统治精英、控制生产手段并摆脱可能对其造成威胁的对象，如何在内部进行权力斗争。这样的动态关系，使得国家中容易产生敌视「所有其他国家」的态度，形成某种零和的思考方式。举乌克兰来说，普丁当时便计划要建立一个新的跨域政权，除了扩大基于身份认同的「asabiyya」在后苏联地区的影响力，还要「尽asabiyya所能」去应对以欧盟和北约为首的外部对手。

> 普丁的「asabiyya」

普丁领导着俄罗斯的「asabiyya」，将政治定义为以暴力和胁迫来实施统治，并使用 ghalbah 和 qahr，意即谋杀或酷刑等残忍手段，来消除和削弱可能危及「asabiyya」正当性与权力的对象。换句话说，普丁正借着在国内镇压反对派、国际上发动带有扩张主义的战争，来将随「asabiyya」崛起而生的过剩物质与象征暴力施展出来。根据 Ibn Khaldun 的观点，一旦「asabiyya」确立自身于国内的优势地位，其就会开始以统治他人、击败较弱势的团体以巩固权力为目标，从而破坏并消解其他敌对统治菁英群体的凝聚力，以免自身的势力减弱。

普丁政权如今未能在乌克兰取得胜利，也无法破除乌克兰的反抗精神，这样的命运，同样可以用 Khaldun 的理论框架来解释。Ibn Khaldun 指出，特定政权最害怕的，其实是「asabiyya」的解体，导致其最终不再能构成、维护和捍卫该政权。之所以会解体，是因为其影响力（即强制征服他人的能力）削弱，财政权力下降便随之而来，最终政权复灭。此外，正如 Yassin al-Haj Saleh 所说，普丁的失败有很大机率会终结自身的政治生涯。这对白俄罗斯、中亚和中东的独裁政权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些政权的生存和稳定，都有赖于普丁跨域政权的支持。因此，随着普丁侵略乌克兰失败，叙利亚阿萨德这类的野蛮、反叛政权也将随之衰落。

> 改进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解释

综上所述，将国际体系内的冲突和危机，全数归因于特定暴君的残暴行为，并忽视经济、政治、战略等因素对国际和当地局势的影响，并不符合 Khaldun 的观点，且是一种错误。事实上，针对俄罗

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及其他地区如叙利亚、中国、美国、以色列等国此一现象，Ibn Khaldun 指出，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统治菁英（曾经或仍然存在的特定集团和社会力量）的角色与功能，并结合其他系统性的线索，以便理解统治菁英如何协助暴力政权建立并维护其权力结构。借由对国内公民以及其他国家施予暴力、镇压行为，这些政权的正当性受到巩固，并能进一步扩展其统治。

不幸的是，学者们在试图想像如何摆脱当今国际政治中暴力的恶性循环时，往往忽视了这种创新的观点。不过，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透过 Khaldun 的框架，我们有机会能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批判性的检视，并重新分析全球案例。自2008年普丁取得绝对权力以来，俄罗斯的侵略事件仍持续地发生，而这套逻辑将能够弥补解释这些事件时，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不足之处。现实主义过度地关注权力平衡、安全与地缘政治因素如何影响由民族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以及如何避免战争、保持和平。而 Ibn Khaldun 的理论不会被侷限于此，其将借由关注权威建构过程的动态，以及社会团结群体（如「asabiyya」）的集体思想，来把黑盒子打开。新自由主义太过重视国际法、制度安排，以及安全共同体思想如何透过提供宝贵的合作资讯来协助决策——这套理论也挑战了这种论点。绝对收益更强调的，是利用制度来降低国家的不安全感，而「asabiyya」的相对收益逻辑取得了支配地位，其将使得绝对收益的优先性降低。■

來信寄至：

Ahmed M. Abozaid

<a.ahmed@soton.ac.uk>

/ Twitter: [@AbozaidahmedM](https://twitter.com/AbozaidahmedM)

